

WORLD AGRICULTURE

(Monthly, Started in 1979)

No.08, 2020

Main Contents

Rural poverty reduction in China sinc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Effectiveness, logic, and future paths WANG Jiayue, WANG Jianzhong, ZHANG Ling (10)

The development model of international food dealers in “One Belt and One Road” and

its reference to China LI Ning, CHEN Huiling, ZHONG Yu, et al (20)

Social capital, transaction costs and formal credit availability with Chinese rural households

..... Yang Mingwan, Zhang Lezhu, Zhang Weikun (30)

Japan’s agricultural structure reform and its enlightenment to China’s current agricultural transformation

..... Jiang Yankun, Zhao Jilun (50)

Has dairy imports hit domestic dairy enterprises?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micro-data of Chinese dairy enterprises

..... WEI Yanjiao, ZHU Jing, ZHANG Yu’ e (57)

Emergency risk assessment of farmer cooperatives based on AHP-Entropy and

fuzzy bayesian network LIU Jing, CAO fu (67)

Spatial correlation and spillover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efficiency of large-scale pig breeding in China

..... LIU Chunming, ZHOU Yang (105)

Effect and cost-effectiveness analysis of students’ health investment in western

rural minority areas Gao Jiayuan, Nie Wei, Peng Lanxi, et al (114)

Edited by World Agriculture Editorial Office

E-mail: shijenongye2008@126.com

Periodical Publications: No.82-130

Published by China Agricultural Press Co., Ltd.

Adress: No.18 Building Maizidian Street,

Chaoyang District, Beijing, China 100125

Editor in Chief: Hu Leming

Vice-Editors in Chief: Zhang Lisi Xu Hui

Executive Chief Editor: Jia Bin

Editors: Zhang Xuejiao Wei Jinjin

Tel: 010-59194435/988/990

Fax: 010-65005665

Website: <http://www.ccap.com.cn>

编辑委员会

主任

屈冬玉

副主任

隋鹏飞 陈邦勋 谢建民

杨易 张陆彪 倪洪兴

童玉娥 夏敬源 朱信凯

委员 (按姓名笔画排序)

丁声俊 才学鹏 万建民

马有祥 王广斌 王钊

王林萍 孔祥智 邓秀新

左常升 平瑛 叶兴庆

冯东昕 匡远配 朱明

朱晶 刘天金 刘汉武

刘国道 刘艳 严端祥

杜志雄 李树超 李翠霞

杨万江 杨振海 杨敏丽

何秀荣 宋昱 宋洪远

张广胜 张弘 张兴旺

张安录 张林秀 张显良

张海森 张越杰 陈昭玖

陈剑平 陈萍 陈盛伟

罗必良 周应恒 屈四喜

赵帮宏 赵鸭桥 胡乐鸣

姜长云 贺军伟 聂凤英

聂新鹏 栾敬东 高强

郭沛 唐忠 黄伟忠

黄延信 崔利锋 彭剑良

韩沛新 程国强 程金根

蒲春玲 雷刘功 樊胜根

潘文博 潘利兵 霍学喜

目次

热点聚焦

- 欧美食品供应链的发展实践及其对中国乡村振兴的启示 徐娟 张昊 李学婷等 (4)
- 精准扶贫以来中国农村减贫：成效、逻辑与未来路径 王佳越 王建忠 张玲 (10)

专题综述

- 国际大粮商“一带一路”发展模式及其对中国的借鉴 李宁 陈会玲 钟钰 (20)
- 社会资本、交易费用与农户正规借贷行为 杨明婉 张乐柱 张苇锟 (30)

政策研究

- 宅基地退出问题探析：政策演进、内在逻辑与研究进展 宋蕾 谢文婷 吕萍 (39)
- 日本农业结构变革及对当前中国农业转型的启示 姜彦坤 赵继伦 (50)

分析预测

- 乳制品进口冲击中国乳企发展了吗？
——基于价格加成视角的实证检验 魏艳骄 朱晶 张玉娥 (57)
- 基于层次分析熵权法和模糊贝叶斯网络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资金互助突发事件风险评估 刘婧 曹富 (67)

主管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
主办单位 中国农业出版社有限公司
指导单位 农业农村部国际合作司
协办单位 农业农村部对外经济合作中心
 农业农村部农业贸易促进中心(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农业行业分会)
 农业农村部国际交流服务中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粮农机构代表处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学院

中国粮食虚拟土地进口效应分析

——基于 2000—2018 年的贸易数据 … 任玉霜 孙灵柱 吕康银 (78)

环 球 瞭 望

典型农产品流通渠道借鉴与启示 …… 郭玉冰 鲁锦涛 许 冰 (86)

欧洲城乡规划及对中国乡村城镇化的启示 …… 陈口丹 (93)

美国转基因玉米产业化的生态及经济影响分析 …… 崔宁波 生世玉 (98)

中 国 农 业

中国规模化生猪养殖环境效率的空间相关及溢出效应 ……
 …… 刘春明 周 杨 (105)

西部少数民族农村学生不同健康促进方式效果评估及成本效益分析 ……
 …… 高佳源 聂 蔚 彭兰晰等 (114)

国 际 粮 农 动 态

“七十七国集团和中国”主席团与 FAO 总干事举行视频见面
 会等 6 则 …… (128)

贸 易 监 测

2020 年 1~5 月中国农产品贸易监测 … 韩 啸 霍春悦 马景源 (132)

2020 年 7 月世界农产品供需形势预测简报 …… 邹 慧 梁 勇 (135)

英 文 摘 要

MAIN ABSTRACTS …… (140)

主 编 胡乐鸣
副 主 编 张丽四 徐 晖
执行主编 贾 彬
责任编辑 张雪娇 卫晋津
编 辑 吴洪钟 张雯婷
 汪子涵 陈 璿
 程 燕

出版单位 中国农业出版社有限公司
印刷单位 中农印务有限公司
国内总发行 北京市报刊发行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
 (北京 782 信箱)

订 购 处 全国各地邮局
出版日期 2020 年 8 月 10 日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
 18 号楼
邮 编 100125
电 话 (010)59194435/988/990
传 真 (010)65005665
投稿邮箱 shijienongye2008@126.com
网 址 http://www.ccap.com.cn

广告发布登记:
 京朝工商广登字 20190016 号

ISSN 1002 - 4433
 CN 11-1097/S

定 价 18.00 元

凡是同意被我刊发表的文章, 视为作者
 同意将其文章的复制权、发行权、汇编
 权以及信息网络传播权转授给第三方。
 特此声明

**本刊所登作品受版权保护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摘编**

● 热点聚焦

欧美食品供应短链的发展实践及其对中国乡村振兴的启示

◆ 徐娟^{1,2} 张昊¹ 李学婷^{1,2} 文华¹

(1. 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武汉 430070; 2. 湖北农村发展研究中心 武汉 430070)

摘要: 食品供应短链是在对产业化农业反思基础上逐渐兴起的一种新型农业发展模式,也是实现农业现代化、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机制。欧美等国食品供应短链的发展实践表明,食品供应短链是现代食品体系的重要补充,其对于重构消费者对食品的信任、推动农村经济及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本文在系统梳理欧美发达国家食品供应短链发展实践的基础上,从发展模式、政府支持策略、合作创新与多元化发展等方面总结归纳了欧美国家食品供应短链的主要特点与经验,并对其进行了比较分析。最后,从生产者与消费者互动、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建设、政策法规完善等方面提出了促进中国城乡统筹、乡村振兴的发展策略。

关键词: 食品供应短链; 可持续发展; 实践与启示

DOI: 10.13856/j.cn11-1097/s.2020.08.001

1 引言

农业可持续发展是中国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但由于受长期粗放型农业增长方式的影响,目前中国乡村发展面临的社会、经济、生态问题压力逐渐增大,乡村振兴任务十分艰巨。例如,农药、化肥等化学物质的过度使用,不仅导致了食品安全危机事件的频发,严重影响了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信心,而且使土壤、水资源等生态环境遭到了破坏,阻碍了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和农业可持续发展。因此,如何科学有效地创新城乡统筹融合发展模式,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迫切需要新的思路和方法。近年来欧美国家食品供应短链的发展为中国乡村振兴和可持续发展提

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路径。

20世纪60年代,工业化农业导致了日益严重的环境、经济和社会问题,如环境污染、生态破坏、食品安全危机、小规模农业生产者被边缘化等^[1-2],

收稿日期: 2020-02-26。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基于社群经济的农产品供应链精准对接机制及其发展策略”(19YJC63019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贫困农户生计资产配置效应与可持续脱贫策略研究”(17BGL131)。

作者简介: 徐娟(1978—),女,湖北天门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农产品供应链管理, E-mail: whitecloudyxj@163.com; 张昊(1994—),男,湖北武汉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农产品供应链管理, E-mail: nine-johnson@qq.com; 李学婷(1975—),女,内蒙古人,蒙族,博士,讲师,研究方向:农业经济管理, E-mail: lixueting@mail.hzau.edu.cn; 文华(1996—),女,湖北武汉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农产品供应链管理, E-mail: 864989285@qq.com。

这些问题引发了人们对现代农业的反思和批判。德国、美国等西方国家率先开始发起抵制农业工业化的食物运动,旨在推动可持续的本地化食物生产和消费、重建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信任并增强小农在食品经济中的地位^[3]。在此背景下,一种新型的食品供应模式——食品供应短链(Short Food Supply Chains)应运而生。后来,食品供应短链在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得到迅速发展。2012年美国食品供应短链模式的农产品销售金额已达到了14亿美元^[4]。欧盟自2011年以来一直在欧洲各国推广食品供应短链模式,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农户采取直销或只通过一个中间商销售农产品。据统计,欧盟国家15%的农户所生产的50%以上的农产品是直接销售给消费者的^[5]。欧美等国食品供应短链的发展实践表明,食品供应短链是现代食品体系的重要补充,其对于重构消费者对食品的信任、推动农村经济及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本文在系统梳理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食品供应短链发展实践的基础上,综合分析不同国家食品供应短链发展实践的特点及启示,以期为中国乡村振兴和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有意义的借鉴。

2 欧盟食品供应短链的发展实践

2.1 欧盟食品供应短链的主要发展模式

(1) 农场个体直销。农场个体直销是食品供应短链最简单的形式,即农户将自己生产的农产品面对面地直接卖给消费者,一般适用于小规模经营农户。欧盟国家的农场个体直销主要有农夫市集、消费者自采(pick-your-own)、路边销售、农场商店销售、盒子计划等。

(2) 农场合伙直销。欧盟食品供应短链的另一种直销形式是多个农场合作或结盟将其农产品销售给消费者个体或群体。合伙直销的场所通常在一个农场或本地商店。例如,本地农场经常会结盟,一起在美食节或集市展示和销售他们的农产品。在大多数欧洲国家,生产者组织会参加当地的公共采购项目,为本地学校或医院提供食品。

(3) 社区支持农业。在欧盟各国,社区支持农业有各种不同的形式,但都有一个共同的本质特征,与消费者共享农场收益。社区支持农业,本质上而言,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是一种合作关系,消费者

参与生产者的生产决策,并承担部分风险和回报。消费者通常在收获前提前支付当年部分的生产投入成本,收获后会收到一定份额的农场通过有机方式种植的新鲜的季节性农产品。有些欧洲国家的社区支持农业,消费者可以参与农场的劳动。农场主也能从社区支持农业中获益,具体包括更稳定的收入以及与消费者更紧密的联系。据欧盟社区支持农业研究统计,2015年约有50万欧洲人曾通过社区支持农业项目购买食物。其中,法国是社区支持农业项目最多的国家,大约2000个,其次是比利时,138个,意大利104个。

(4) 网络直销。即消费者通过网上商店在线购买所需要的农产品,农户通过第三方物流或自营物流将农产品配送给消费者。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欧洲农户通过网络商店将所生产的农产品直接销售给消费者。学者Kneafsey等的研究表明,欧洲采用线上销售的农场数量占农场总量的20%左右,这些农场大多是大型农场,农场面积大于1100hm²,雇员数量在900人以上,大型农场的农产品产量大,通过网络销售的方式,其消费市场更广阔^[6]。

2.2 欧盟食品供应短链的发展特点

2.2.1 实施农业补贴政策

欧盟非常重视食品供应短链的发展,2014—2020年欧盟乡村发展战略(EU Rural Development Policy 2014—2020)第一次明确定义了食品供应短链,并提出重点发展食品供应短链。欧洲议会、欧洲乡村发展农业基金也提出支持欧洲食品供应短链的发展。2016年欧洲议会农业和农村发展委员会委托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欧盟总共投资111亿欧元的公共资金用于促进食品供应短链、增加农产品附加值及质量改进项目的发展,占总的乡村发展规划资金的7.5%。其中,有11个欧盟成员国将95%以上的农村发展计划资金分配到食品供应短链和本地市场领域。欧盟促进食品供应短链发展的措施包括农业实物投资、动物福利、供应链合作、生产者团体建设、农产品质量项目等,具体资金占比分别为58.7%、19.9%、6.9%、6.0%、5.5%^[5]。

欧盟主要国家针对食品供应短链的立法措施主要体现在欧盟共同农业政策中,其立法的主要目的是补贴食品供应短链的参与者,推动农村地区经济

和环境可持续发展。在 2014—2020 年欧盟乡村发展战略中,明确定义食品供应短链是涉及数量较少的经营者、有合作承诺、推动农村地区发展、紧密连接生产者和消费者的食品供应链^[6]。对食品供应短链的定义,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生产方式具有可持续发展的特点,包括减少 CO₂ 排放、保持生物多样性等。例如,欧盟在法规 1698/2005 中提出在农村地区补贴食品供应短链,其中涉及鼓励农民参与食品质量标准的制定,这不仅增加了农户参与食品供应短链的积极性,而且食品质量标准将优质产品和产地紧密关联,为农村本地经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另外,为生产者提供补贴是欧洲有机农业立法逐渐完善的缩影,其中标签认证制度是其提供补贴的重点,对具有标签认证的生产者实施定向补贴,有效提高了本地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2.2.2 重视农产品标签和品牌认证

在欧洲,欧盟制定了标签认证系统,广泛应用于各类食品供应短链中。标签上不仅显示农产品最基本的成分表、原产地等信息,还包括农产品是否有机的认证及溯源系统等^[7]。与美国和日本农产品认证不同的是,欧洲的农产品认证除了包含必要的营养表和原料成分外,同时还附有农产品的价值信息,如品质、新鲜度、味道等。农产品标签提供的有关质量和原产地的信息成为消费者购买决策的重要依据。在法国,标签认证系统广泛应用于奶酪和葡萄酒行业。

此外,品牌是欧洲国家农产品标签认证的一种普遍形式。例如,在意大利,慢食协会(Slow Food Association)一直致力于如何增加本地农产品的价值。慢食产品集品质、历史和文化于一体,一些带有慢食品牌的产品引起了许多消费者的兴趣。以意大利阿尔伯斯农场(Alberese Farm)为例,该农场在 2002 年成立之初,农场食品的直销份额一直很低。在通过 Alberese 品牌认证后,该农场销售价值超过 100 万欧元。其中,Alberese 的面包和意大利面是由保证原产地的食品工业协议生产,在市场上深受消费者的喜爱。Alberese 的其他产品如 Morellino 葡萄酒、软质和硬质小麦等也享有很高的赞誉度。

2.2.3 注重供应链合作创新和可持续发展

为了促进欧洲农产品供应短链的可持续发展,欧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增加供应链成员之间的协同

合作,如在 2014—2020 年欧盟乡村发展战略中,明确提出通过合作促进农产品供应短链的发展,具体包括“农产品供应短链和本地市场中供应链成员之间的横向和纵向合作策略”“促进农产品供应短链和本地市场发展的推广活动”,其预算资金占有乡村公共发展基金的 6.9%^[6]。欧盟委员会的专家经过分析研究认为协作型供应短链能有效改善面向消费者的产品范围,增加生产者和加工商之间的资源共享,增强农户的谈判能力,减少小规模生产农户之间的竞争。同时,欧盟也非常重视农产品供应短链的创新发展,于 2012 年专门成立了欧洲农业创新协会,旨在促进农林业竞争性和可持续发展。

3 美国食品供应短链的发展实践

3.1 美国食品供应短链的主要发展模式

(1) 农夫市集。农夫市集是美国食品供应短链的重要组织形式之一。近几年,农夫市集在美国发展迅速。美国农业部的统计数据表明,2018 年,美国农夫市集的数量已达 8 720 个,相比 2000 年增长了近 3 倍^[8],其大部分分布在美国东北部、中西部以及西海岸城市聚集地,其中以东北部的纽约州和西海岸的加利福尼亚州数量最多。美国农夫市集拥有完善的准入制度,其中最重要的两项规定是对农场到城市的距离限制和必须通过政府检验取得合格证书。相关研究表明农夫市集的发展大力推动了美国本地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本地就业机会。美国农夫市集除了销售农产品以外,还会宣传有关农产品营养学的科普教育信息以指导健康饮食,同时还提供其他种类的商品和服务,如艺术品、日用品等。

(2) 社区支持农业。美国社区支持农业主要有两种类型:股份型和订购型。前者由消费者发起,成立一个非营利性组织,与农场或农户相互配合,通过有机生产的方式种植特定产品;后者由生产者发起,向订购的顾客销售当季农产品。美国社区支持农业的具体经营方式可分为产品线规划、会员制和线上线下联合销售。其中,会员制侧重于增加消费者的参与度,其以订购模式为基础,将消费者分成不同的群体,进行个性化的服务。线上线下联合销售侧重于加强对农场的宣传,线上建立网站,刊登相关的图片介绍农场和农产品相关的信息,还会

发布农场近期活动；线下印刷宣传册，定期举办活动，加强消费者对农场的认同感。

(3) 农场到学校项目。美国出台了多种政策鼓励农场到学校项目 (Farm to School Program) 的发展。美国农业部 2015 年的调查数据表明，截至 2014 年，美国已经有 51 个地区，12 300 所学校和 690 万学生参与了农场到学校项目，是 2009 年的 1.4 倍^[9]。农场到学校项目的经营方式有两种，其中一种是由政府直接采购，另一种是农业部代表学校进行农产品采购。学校可以从当地多个农场中选择，并且可以向农场提出要求。政府采购为这些农场提供了相对稳定的销售渠道。

3.2 美国食品供应短链的发展特点

3.2.1 政府统筹规划，制定重点项目扶持计划

《2018 年美国农业提升法案》明确提出建立本地农业市场规划，支持生产者—消费者农产品直销市场的发展，具体包括：①促进农夫市集、路边销售、社区支持农业、网络销售等多种食品供应短链形式的发展。②支持促进本地和区域性食品销售的农产品加工、分销和存储等的发展。③为农产品生产者制定营销策略。④促进食品供应链的区域协调发展。⑤为实现农产品从生产者—消费者的直销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⑥承担获得食品安全认证、设备升级等提高食品供应短链安全性相关的费用。

同时，美国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推动食品供应短链项目的发展，尤其是针对农夫市集和农场到学校项目。例如，美国相继推出了农夫市集和本地食品扶持规划、农夫市集营养规划和农夫市集在线网站。从 1976 年开始，有关农夫市集的法规政策不断完善，最终形成农夫市集和本地食品扶持规划，该项目已经在美国 50 个州内实行，政府资助的范围和金额也在不断扩大。农夫市集营养规划通过发放优惠券的方式，不仅扩大了消费者的参与度，尤其是低收入消费者，而且增加了农户的收入。农夫市集在线网站则为农夫市集建立了信息平台，集中发布相关信息，形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虚拟社区，同时网站还为移动网络用户提供其他相关服务。

3.2.2 小规模农场是参与食品供应短链的主力军

美国农业普查会根据农场年销售额划分农场规模：年销售额 5 万美元以下的农场为小型农场；年销售额 5 万~50 万美元的农场为中型农场；年销售

额 50 万美元以上的农场为大型农场。截至 2017 年，美国大约有 204 万个农场，其中 71% 是小规模农场，大部分由家族经营。小规模农场的产值在美国农业中所占比例较低，产值占比不足 3%。但相比大中型农场，美国小规模农场参与食品供应短链的比例是最高的。据统计，1992—2012 年，平均 80.5% 左右的短链农场都是小型农场，中型农场占 17.1%，大型农场参与占比很小，不足 3%^[10]。所以小型农场是参与食品供应短链的主力军。而且，近几年美国食品供应短链发展十分迅速。2017 年的美国农业普查数据表明，美国参与食品供应短链农场的比例呈现逐年上升趋势。

3.2.3 多元化发展

美国食品供应短链的发展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具体表现为农产品品类多元化、组织形式多元化和经营方式多元化。美国食品供应短链提供的农产品种类较丰富，包括绿色蔬菜、水果、奶酪、鱼、花、酒、酱汁等多种农产品。例如，随着消费者需求的多样化，美国社区支持农业提供的奶酪、鱼、花等农产品的比例逐年提高，从 2011 年的 10% 扩大到 2016 年的 35%。另外，美国食品供应短链的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也多种多样，具体组织形式包括农夫市集、社区支持农业、盒子计划、农场到学校、网络直销等，一应俱全。其中，农夫市集和社区支持农业发展的比较成熟。

4 欧美食品供应短链发展实践的比较分析

在上述对欧盟和美国食品供应短链发展实践分析的基础上，以下从政策支持、发展模式和实施效果 3 个方面对其进行比较分析。

(1) 从政策支持来看，欧盟和美国政府都非常重视食品供应短链的发展，制定了相对较完善的政策支持体系，覆盖面也较广，具体包括农业补贴、实物投资、技术支持、质量品牌建设、营销支持等。2014—2020 年欧盟乡村发展战略专门制定了促进食品供应短链和本地市场发展的支持措施，具体包括资金、人才培养、生产者组织等，而且资金支持力度较大。同时，欧盟非常重视食品供应短链中农产品标签和品牌认证，2012 年出台的农产品质量规划条例中特别提到本地农场和直销农产品的标签方案。与欧盟相比，美国对食品供应短链的扶持采用重点

项目发展策略,重点支持社区支持农业、农夫市集、农场到学校项目的发展,针对每一项目制定了具体的补贴策略、保险策略、营销策略等。例如,为了推动社区支持农业的持续发展,美国对社区支持农场实施了生产合同补贴、农业灾害补贴等,同时积极引导农场投保标准责任险和健康险。

(2)从发展模式来看,欧美各国食品供应短链的发展模式多种多样,主要包括农夫市集、农场商店销售、社区支持农业、盒子计划、农场到学校项目、网络直销等。其中,社区支持农业、网络直销是欧美国家食品供应短链发展较快的两种形式。尤其是近几年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农产品网络直销作为一种新型食品供应短链模式,已成为农产品销售的主要方式之一。与欧洲各国相比,农夫市集、社区支持农业、农场到学校项目是美国政府重点支持的农产品供应短链模式,因此发展较快。

(3)从实施效果来看,欧美食品供应短链的发展对于促进当地农村经济、社会及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欧洲农业创新联盟研究小组的研究表明,食品供应短链极大地改善了当地农村的基础设施条件,增加了农户在供应链中的谈判能力,增加了农民收入,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消费者对农产品的信任,减少了环境污染等^[1]。相对于欧洲国家,美国食品供应短链的参与者主要是中小农场,中小农场通过与消费者建立直接联系,增加了消费者信任,同时这种信任也有助于生产者提高产品质量和环保意识,从而进一步促进社区及本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食品供应短链成为美国中小型农场经济收入的重要增长点。

5 对中国乡村振兴的启示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食品供应短链作为一种在对产业化农业反思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型农业发展模式,强调农业的健康、生态、社会等功能,关注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互动交流,重视本土化经济发展。欧美等国食品供应短链的发展实践表明,食品供应短链是现代食品体系的重要补充,其对于优化农产品供应链、推动乡村经济及生

态环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具体表现在环境保护、营养和健康、食品质量安全、营利性和利益公平分配等方面。因此,在当前乡村振兴背景下,从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视角,重构本地食品体系,促进食品供应短链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在中国,尽管农贸市场在食品流通中占主导地位,近几年社区支持农业、农夫市集、观光农业、农超对接、农产品网络直销等食品供应短链形式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尤其是农产品网络直销形式发展迅速。但由于中国食品供应短链刚刚起步,在发展过程中仍面临食品安全认证成本高、生产率低、发展规模小等一系列问题,因此本文鉴于欧美发达国家的发展实践与经验,提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建议。

5.1 加强对食品供应短链发展的政策支持

食品供应短链在中国属于新生事物,其发展离不开政府在规划、监管、宣传、信息化服务等方面的支持。欧盟为促进欧洲各国食品供应短链的发展,在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种养技术培训、生产者组织等方面提供了一系列的支持措施。例如,2014—2020年欧盟乡村发展战略中明确提出了10条关于食品供应短链发展方面的策略,具体包括:知识转移和信息传播、咨询服务、农场管理和农场救济服务、农产品质量发展规划、农场和企业发展、农村地区基本服务和村庄宣传展示等。2016年欧洲议会关于农业和乡村发展的调查研究表明,75%的欧洲乡村发展资金用于整合食品供应短链以提高其农产品的市场竞争性,其中有11个成员国将95%的乡村优先发展资金投入食品供应短链领域。美国也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支持农夫市集、社区支持农业、农场到学校项目等食品供应短链的发展。目前,中国农夫市集、社区支持农业、网络直销等供应短链形式处于发展初期,各级政府应因地制宜,针对区域内的特色农产品,制定相应的发展规划、支持政策及实施细则,如实施可追溯制度,建立产品质量标准体系,鼓励农户进行有机生产与种植,为农户与本地居民构建更多的沟通渠道等,从而推动食品供应短链的可持续发展。

5.2 注重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加快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建设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互联网成为食品供应短

链发展的重要工具,网络直销成为食品供应短链的重要形式之一。近几年,中国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支持农产品电子商务的发展,农产品电子商务交易总量持续攀升,发展势头良好。但由于保鲜、物流、质量安全等因素的制约,农产品网络直销占比仍较小,需要从供应链管理、物流网络、电子商务平台建设等方面进行优化,形成线上线下互促共进的发展格局,疏通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壁垒,加强两者之间的交流联系,实现农产品生产、营销与消费的多渠道融合发展。中国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的建设可以借鉴欧美国家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的发展模式。例如,FARMIGO是美国一家新型的大型农产品在线交易平台,其并不参与农产品的销售,主要功能是有整合商家和消费者信息,保证双方在公平的环境中进行交易。FARMIGO的经营理念是“致力于创建健康的替代食物体系,以给每一代人提供新鲜、实惠和健康的本地食物”。其将地理位置相近的消费者整合到同一个“食物社区”当中,并与当地的农场相匹配。FARMIGO会为每一个社区的特色定制网页,在网页中提供当地的农产品信息,方便社区用户在线订购。同时,其还会帮助消费者社区管理员积极进行宣传以吸引更多消费者加入社区。

5.3 增加生产者与消费者互动交流渠道,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恢复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联系、建立信任关系以及消费者社会责任是食品供应短链治理机制的运行基础。从上述欧美国家食品供应短链的发展经验看,大部分国家从多方位构建生产者—消费者互动交流的平台与渠道,以增强消费者对农产品生产过程的了解与信任。当前,中国大部分农产品生产者与消费者缺乏有效的交流互动,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信心缺失。我们应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鼓励农民合作社、消费者合作社和农民协会等组织开展多种活动与合作,吸引城市居民和企事业单位如学校、科研部门、农业技术推广部门等的广泛参与,增强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关联和互动,探索适合本土食品供应短链发展的多元化道路。例如,2018年9月,南京市举办了以“农民的节日,市民的盛会”为主题的农业嘉年华活动,活动向市民和游客展示了都市农业的新成果、现代农业的新科技、现代农民的新风采。据统计,南京市农业嘉年华实现了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丰收,累计带动游客近430万人次,实现综合收入约10.7亿元,成为推进农业产销对接与品牌提升,搭建农民市民交流互动、城乡融合发展的桥梁和纽带。

参考文献

- [1] 陈卫平. 社区支持农业(CSA)消费者对生产者信任的建立: 消费者社交媒体参与的作用[J]. 中国农村经济, 2015(6): 33-46.
- [2] 杨娟. 发达国家CSA对发展中国农业经济的启示[J]. 世界农业, 2016(11): 51-55.
- [3] 司振中, 代宁, 齐丹舒. 全球替代性食物体系综述[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35(4): 128-137.
- [4] HARA J K, LOW S A. The influence of metropolitan statistical areas on direct-to-consumer agricultural sales of local food in the northeast[J]. *Agricultur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 Review*, 2016, 45(3): 539-562.
- [5] AUGÈRE-GRANIER M L. Short food supply chains and local food systems in the EU[J]. *European Parliamentary Research Service*, 2016(9): 586-650.
- [6] KNEAFSEY M, VENN L, SCHMUTZ U, et al. Short food supply chains and local food systems in the EU: a state of play of their socio-economic characteristics[R]. Edificio Expo.; Joint Research Center Scientific and Policy Reports, 2013.
- [7] YUNA C, SARAH M A, ARIELLE C. From short food supply chains to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in urban food systems: food democracy as a vector of transition[J]. *Agriculture*, 2016, 6(4): 57.
- [8] Farmers markets and direct-to consumer marketing. Agricultural marketing service, U. 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EB/OL]. [2019-12-27]. <https://www.ams.usda.gov/services/localregional/farmers-markets-and-direct-consumer-marketing>.
- [9] USDA FNS-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Food and Nutrition Service. The National Farm to School Census[EB/OL]. (2016-10-30) [2019-12-27]. <https://farmtoschoolcensus.fns.usda.gov/>.
- [10] HORST M, GWIN L. Land access for direct market food farmers in Oregon, USA[J]. *Land Use Policy*, 2018(75): 594-611.
- [11] EPI-AGRI Focus Groups. Innovative short food supply chain management-Final report[R]. Brussels: Agriculture & Innovative, 2015.

精准扶贫以来中国农村减贫： 成效、逻辑与未来路径

◆ 王佳越 王建忠 张 玲

(河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保定 071000)

摘要：精准扶贫以来，中国农村减贫取得巨大成效，主要体现在：宏观层面上，贫困人口减少、脱贫摘帽县数量增加、世界减贫的中国贡献；微观层面上，贫困人口收入、消费水平提高，生活条件、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改善。依托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和市场、社会的广泛参与，实现减贫主体的精准；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增加了贫困地区的财政供给，实现了减贫路径的精准；第三方评估的开展，保证了脱贫质量，实现了减贫保障的精准；贫困人口的精准识别、“扶志”“扶智”政策的实施、“输血”向“造血”功能的转变，培育了贫困户脱贫的内生动力，实现了减贫对象的精准。2020年后，中国面临脱贫攻坚成果巩固及乡村振兴战略的双重叠压，可从统筹减贫主体、调整减贫路径、保障持续投入、重视相对贫困4个方面优化2020年后农村减贫路径。

关键词：精准扶贫；农村减贫；乡村振兴

DOI: 10.13856/j.cn11-1097/s.2020.08.002

1 引言

精准扶贫是脱贫攻坚决胜阶段国家扶贫开发的战略创新^[1]，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的坚实基础。精准扶贫方略实施以来，中国为世界减贫事业做出突出贡献。按照现行农村贫困标准测算，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由2012年年末的9 899万人下降到2019年年末的551万人，连续7年年均减贫规模超过1 000万人，贫困人口大幅减少，未脱贫人口大部分为老弱病残等特殊困难群体；贫困人口的收入和生活水平、贫困地区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提升明显，精准扶贫方略取得明显成效。

精准扶贫生成的理论基础是“共同富裕”，目标

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精准扶贫彰显了超强的国家治理能力，为世界减贫贡献了中国智慧，其所内涵的“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2]，为新时代脱贫攻坚提供了理论依据。不同学者围绕精准扶贫4方面的内容开展了全面的研究。精准

收稿日期：2020-03-01。

基金项目：河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经济技术协同视角下河北省贫困地区现代农业发展创新研究”（ZD201713），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河北省乡村振兴战略与贫困治理协同推进机制研究”（HB19GL033）。

作者简介：王佳越，河北正定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反贫困理论与实践、资产管理与评估，E-mail: wjychina@163.com；王建忠，河北行唐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农业经济理论与实务；张玲，河北石家庄人，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农业经济理论与实务。

识别模型的构建^[3]、个体多维度贫困测度模型^[4]及大数据技术的应用^[5],明确了扶贫对象,解决了“扶持谁”的问题。驻村帮扶的贫困治理分析框架的构建^[1],明确了帮扶主体,通过发挥驻村书记的作用,带领贫困户实现稳定脱贫^[6-7];同时,在政府主导之外,推动市场和社会力量参与减贫,解决了“谁来扶”的问题。针对贫困人口实施的产业发展^[8-10]、易地搬迁^[11-12]、生态补偿^[13]、发展教育^[14]、社会保障等政策,从不同视角和不同的贫困维度提出农村减贫方案,解决了“怎么扶”的问题。为提高脱贫攻坚成果的可信度,国家引入精准扶贫第三方评估。通过确定第三方评估的流程与规范^[15],找出脱贫攻坚中存在的问题,保证贫困户、贫困村、贫困县精准退出,解决了“如何退”的问题。

2020年后,现行标准下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后,中国将进入全面小康社会。下一步减贫重点是什么,如何解决城市人口贫困问题,缓解城乡之间的差异?这背后是相对贫困问题的提出、城乡发展不平衡导致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差异等问题。针对农村减贫,上述文献分别从“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等角度入手,丰富了精准扶贫的理论与实践,但只基于其中单个方面,未能从总体上分析精准扶贫以来的减贫成效及其背后的逻辑。本文从宏观和微观这一全新视角出发,梳理了精准扶贫以来中国农村减贫的成效及其逻辑。这为相对贫困问题的解决、脱贫质量的提升、减贫长效机制的建立、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的有机衔接提供了有益思路和方案。

2 精准扶贫以来中国农村减贫成效

精准扶贫以来,经过近7年的攻坚拓难,中国脱贫攻坚成果显著。这一成果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一是宏观层面,主要是贫困人口的减少、贫困区域贫困现状的改观、年脱贫摘帽县比例的增加及世界减贫的中国贡献等。二是微观层面,主要是贫困人口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提高、生活条件及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改善。

2.1 宏观层面的减贫成效

从宏观角度来看,中国减贫成效主要可以从贫困人口减少情况、贫困县摘帽比例、区域减贫成效、

世界减贫的中国贡献等进行分析。

(1) 贫困人口^①大幅减少。2013—2019年连续7年年均减贫人口超过1 000万人,其中2013年减贫人数最多。贫困人口从2012年年末的9 899万人下降到2019年年末的551万人,累计减贫人口9 348万人;贫困发生率逐年降低,从2012年年末的10.2%下降至2019年年末的0.6%。具体减贫人口数如表1所示。

表1 精准扶贫以来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情况

年份	剩余贫困人口 (万人)	减贫人口 (万人)	累计减贫人口 (万人)	贫困发生率 (%)
2012	9 899	—	—	10.2
2013	8 249	1 650	1 650	8.5
2014	7 017	1 232	2 882	7.2
2015	5 575	1 442	4 324	5.7
2016	4 335	1 240	5 564	4.5
2017	3 046	1 289	6 853	3.1
2018	1 660	1 386	8 239	1.7
2019	551	1 109	9 348	0.6

数据来源: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国家统计局。表3同。

(2) 贫困县脱贫摘帽数量和速度逐年上升。从2016年度开始,为强化脱贫攻坚成效考核,中国开始引入精准脱贫第三方评估。贫困县退出遵循严格的程序和标准,先由省级部扶贫部门组织评估验收合格后,再由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第三方专项评估,待综合贫困发生率、贫困人口漏评率和错退率、群众认可度等指标达到标准后,由省政府批准退出^②。从表2可以看出,2016年度全国有28个县脱贫摘帽^③,占比3.37%;2017年度为125个,占比15.02%;2018年度为283个,占比34.01%;2019年度为344个,占比41.35%。从脱贫摘帽速度来看,年脱贫摘帽县比例和速度明显增长,2018和2019年度脱贫摘帽县占比明显高于2016和2017年度。截至2019年年底,脱贫摘帽县累计达到780个,累计占比93.75%,超过90%。

① 贫困人口数量以2010年价格确定的每人每年2 300元的贫困标准确定。

② 从2018年度开始,贫困县退出专项评估检查由各省统一组织实施,中央按20%比例进行抽查。

③ 这是中国自1986年设立贫困县以来,第一次实现贫困县数量的减少。

表 2 贫困县脱贫摘帽情况分析^①

年份	摘帽县数量 (个)	占比 (%)	累计摘帽县 数量(个)	累计占比 (%)
2016	28	3.37	28	3.37
2017	125	15.02	153	18.39
2018	283	34.01	436	52.40
2019	344	41.35	780	93.75

数据来源：根据有关新闻整理所得。

(3) 各区域减贫成效显著。从各区域脱贫人口

表 3 精准扶贫以来各区域剩余贫困人口

年份	东部		中部		西部	
	贫困人口(万人)	贫困发生率(%)	贫困人口(万人)	贫困发生率(%)	贫困人口(万人)	贫困发生率(%)
2012	1 367	3.9	3 446	10.6	5 086	17.5
2013	1 171	3.3	2 869	8.8	4 209	14.5
2014	956	2.7	2 461	7.5	3 600	12.4
2015	653	1.8	2 007	6.2	2 914	10.0
2016	490	1.4	1 594	4.9	2 251	7.8
2017	300	0.8	1 112	3.4	1 634	5.6
2018	147	0.4	597	1.8	916	3.2
2019	47	0.1	181	0.5	323	1.1

注：因未给出明确比率，2019年各区域贫困发生率为估算。

(4) 世界减贫的中国贡献。中国对世界减贫贡献率超过 70%^②，是世界减贫人口最多的国家，为世界减贫做出了突出贡献。这一贡献主要体现在减贫速度和经验模式借鉴两个方面。从减贫速度来看，中国减贫速度明显快于全球。按照人均每日 1.9 美元的国际贫困标准，从 1981 年年末到 2015 年年末，中国贫困发生率年均下降 2.6%，同期全球贫困发生率年均下降 0.9%，中国年均减贫速度较世界平均速度高 1.7%。从经验模式的借鉴来看，精准扶贫方略建立了一套贫困人口识别与帮扶的方法，带动贫困人口从“输血”向“造血”转变，建立脱贫长效机制，为世界提供了减贫对象识别方面的经验；确立了政府主导、多元社会组织参与的扶贫开发模式，形成多元主体参与农村减贫，为世界提供了减贫主体方面的经验；实施“五个一批”，从发展生产、易地搬迁、生态补偿、发展教育、社会保障 5 个维度，为世界提供了减贫路径方面的经验；建立第三方评估机制，客观评价农村减贫成果，保障了减贫成效的真实可靠，为世界提供了减贫成效检验

来看，东部地区相对变动最为明显，贫困人口下降了 96.56%；西部地区因贫困人口基数大，贫困人口绝对数量变化最大，下降了 4 763 万人。从贫困发生率指标来看，东部地区由 2012 年的 3.9% 下降到 2019 年的 0.1%，下降 3.8%；中部地区由 2012 年的 10.6% 下降到 2019 年的 0.5%，下降 10.1%；西部地区则由 2012 年的 17.5% 下降到 2019 年的 1.1%，下降 16.4%。总的来看，各区域贫困人口数量和贫困发生率均有较大幅度的下降。

方面的经验。

2.2 微观层面的减贫成效

从微观角度来看，中国减贫成效可以从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增长、消费水平的提升、生活条件的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分析。

(1) 贫困地区农民增收明显。经过近 7 年的扶贫攻坚，贫困地区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较 2012 年有较大提升。由表 4 可知，贫困地区 2018 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10 371 元，较 2012 年提高 98.91%。2013—2018 年年均名义增长 12.08%，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实际增长 10.03%，均高于全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率。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由 2012 年的 62.15% 上升到 2018 年的 70.95%，提高 8.8%。总的来看，中国贫困地区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有

① 贫困县总数量按照 832 个计算。

② 数据来源：中国贫困监测报告。

较大幅度的上升，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与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异越来越小。

表 4 贫困地区及全国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年份	贫困地区农村			全国农村			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 (%)
	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名义增速 (%)	实际增速 (%)	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名义增速 (%)	实际增速 (%)	
2012	5 214	—	—	8 390	—	—	62.15
2013	6 079	16.60	13.40	9 430	12.40	9.30	64.46
2014	6 852	12.70	10.70	10 489	11.20	9.20	65.33
2015	7 653	11.70	10.30	11 422	8.90	7.50	67.00
2016	8 452	10.40	8.40	12 363	8.20	6.20	68.37
2017	9 377	10.50	9.10	13 432	8.60	7.30	69.81
2018	10 371	10.60	8.30	14 617	8.82	6.60	70.95

数据来源：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其中 2012 年贫困地区和全国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根据 2013 年度数据计算得出。表 5 同。

(2) 贫困地区农村常住居民消费水平显著提高。从表 5 来看，贫困地区农村常住居民人均消费支出逐年提高，由 2012 年的 4 703 元增加到 2018 年的 8 956 元，提高 90.43%；贫困地区农村常住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占全国农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例从 2012 年的 70.50% 上升到 2018 年的 73.87%，二者之间差距逐年缩小；除 2014 年外，贫困地区

常住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速均高于全国农村；2013—2018 年，贫困地区农村常住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名义平均增速和实际平均增速分别达到 11.37% 和 9.33%，较全国农村高 0.92% 和 0.90%。总的来看，中国贫困地区农村常住居民人均消费支出逐年上升，保持平稳较快增长且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与全国农村间差异逐年缩小。

表 5 贫困地区及全国农村常住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年份	贫困地区农村			全国农村			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占全国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例 (%)
	人均消费支出 (元)	名义增速 (%)	实际增速 (%)	人均消费支出 (元)	名义增速 (%)	实际增速 (%)	
2012	4 703	—	—	6 677	—	—	70.50
2013	5 404	14.90	11.80	7 485	12.10	9.00	72.20
2014	6 007	11.20	9.20	8 383	12.00	10.00	71.66
2015	6 656	10.80	9.40	9 223	10.00	8.60	72.17
2016	7 331	10.10	8.10	10 130	9.80	7.80	72.37
2017	7 998	9.20	7.80	10 955	8.10	6.80	73.01
2018	8 956	12.00	9.70	12 124	10.70	8.40	73.87

(3) 贫困地区农村居民生活条件得到较大的改善。变化主要体现在贫困地区农村居民家庭生活条件的改善和耐用消费品数量的增加，如表 6 所示。从居住条件来看，贫困地区农村居民居住条件得到较大提升：居住在钢筋混凝土房或砖混材料房的农户比重由 2012 年的 39.2% 增长到 2018 年的 67.4%，提高 28.2%；居住在竹草土坯房的农户比

重由 2012 年的 7.8% 下降到 2018 年的 1.9%，降幅明显；饮水无困难的农户比重由 2013 年的 81.0% 增长到 2018 年的 93.6%，上升 12.6%。从耐用消费品来看，每百户拥有冰箱、洗衣机、汽车和计算机的数量在 2018 年分别达到 87.1 台、86.9 台、19.9 辆、17.1 台，较 2012 年分别增长 83.37%、66.16%、637.04%、216.67%，减贫成效明显。

表 6 贫困地区农村生活条件的变化

年份	居住在钢筋混凝土房或砖混材料房的农户比重 (%)	居住在竹草土坯房的农户比重 (%)	饮水无困难的农户比重 (%)	每百户拥有冰箱数量 (台)	每百户拥有洗衣机数量 (台)	每百户拥有汽车数量 (辆)	每百户拥有计算机数量 (台)
2012	39.2	7.8	—	47.5	52.3	2.7	5.4
2013	—	7.0	81.0	52.6	65.8	5.5	7.9
2014	48.6	6.6	82.3	60.9	71.1	6.7	11.1
2015	52.5	5.7	85.3	67.9	75.6	8.5	13.2
2016	57.1	4.5	87.9	75.3	80.7	11.1	15.1
2017	58.1	4.1	89.2	78.9	83.5	13.1	16.8
2018	67.4	1.9	93.6	87.1	86.9	19.9	17.1

数据来源：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

(4) 贫困地区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获得较快发展。国家重视对贫困地区农村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的投入，这对提升农村居民生活质量、提高交通出行便利度、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有基础性作用。从表 7 可以看出，贫困地区农村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提升明显。从基础设施来看，通有线电视信号的自然村比重由 2012 年的 69.0% 上升到 2018 年的 88.1%，通宽带的自然村比重由 2012 年的

38.3% 上升到 2018 年的 81.9%，村内主干道经过硬化的自然村比重由 2013 年的 59.9% 上升到 2018 年的 82.6%，通客运班车的自然村比重由 2013 年的 38.8% 上升到 2018 年的 54.7%。从公共服务来看，所在自然村上幼儿园便利的农户比重由 2013 年的 71.4% 上升到 2018 年的 87.1%，所在自然村垃圾能集中处理的农户比重由 2013 年的 29.9% 上升到 2018 年的 78.9%。

表 7 贫困地区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变化

年份	通有线电视信号的自然村比重 (%)	通宽带的自然村比重 (%)	村内主干道经过硬化的自然村比重 (%)	通客运班车的自然村比重 (%)	所在自然村上幼儿园便利的农户比重 (%)	所在自然村垃圾能集中处理的农户比重 (%)
2012	69.0	38.3	—	—	—	—
2013	70.7	41.5	59.9	38.8	71.4	29.9
2014	75.0	48.0	64.7	42.7	74.5	35.2
2015	79.3	56.3	73	47.8	76.1	43.2
2016	81.3	63.4	77.9	49.9	79.7	50.9
2017	86.5	71.0	81.1	51.2	84.7	61.4
2018	88.1	81.9	82.6	54.7	87.1	78.9

数据来源：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因 2012 年部分项目数据缺失，部分项目选择 2013 年为基期进行分析。

2.3 减贫成效评价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脱贫攻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以往面向贫困区域“大水漫灌”式的扶贫方式不同，精准扶贫强调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精准退出，对贫困人口识别、扶贫项目安排、资金使用方式、措施到户、因村派人、减贫成效等提出了具体要求和安排，农村贫困问题得到相当大的缓解。贫困地区农村常住人口收入水平、消费支出、生活水平、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较以往

均显著提升，贫困人口减少、区域减贫、贫困县脱贫摘帽及世界减贫的贡献成绩斐然。预期到 2020 年年底，中国在现行标准下的贫困人口将实现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彻底解决绝对贫困问题，为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3 精准扶贫以来中国农村减贫的逻辑

精准扶贫以来中国农村减贫在宏观和微观层面取得诸多成效。2020 年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收

官之年，梳理农村减贫成效背后的逻辑有助于未来减贫的持续推进与质量提升。本文主要从宏观和微观层面对农村减贫逻辑进行分析，以期找出农村减贫成效背后的逻辑，为2020年后农村减贫及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提供有益经验和路径支撑。

3.1 农村减贫的逻辑框架

农村减贫成效受益于精准扶贫方略的持续推进。本文梳理了精准扶贫以来中国农村减贫的逻辑：以政府为主导、多元市场主体参与，依托快速的经济

发展与财政支撑，瞄准贫困主体实施多项政策措施，带动贫困户从“输血”向“造血”转变，培育贫困户脱贫的长效机制，通过第三方评估判断是否达到脱贫标准，最终达到减贫目标。农村减贫的逻辑框架分析如图1所示。从图1可以看出，减贫的宏观逻辑主要沿着减贫主体（谁来扶）、减贫路径（怎么扶）、减贫保障（如何退）展开，减贫的微观逻辑主要针对减贫对象（扶持谁）。从宏观到微观，精准扶贫的减贫框架作为一个整体，其要素缺一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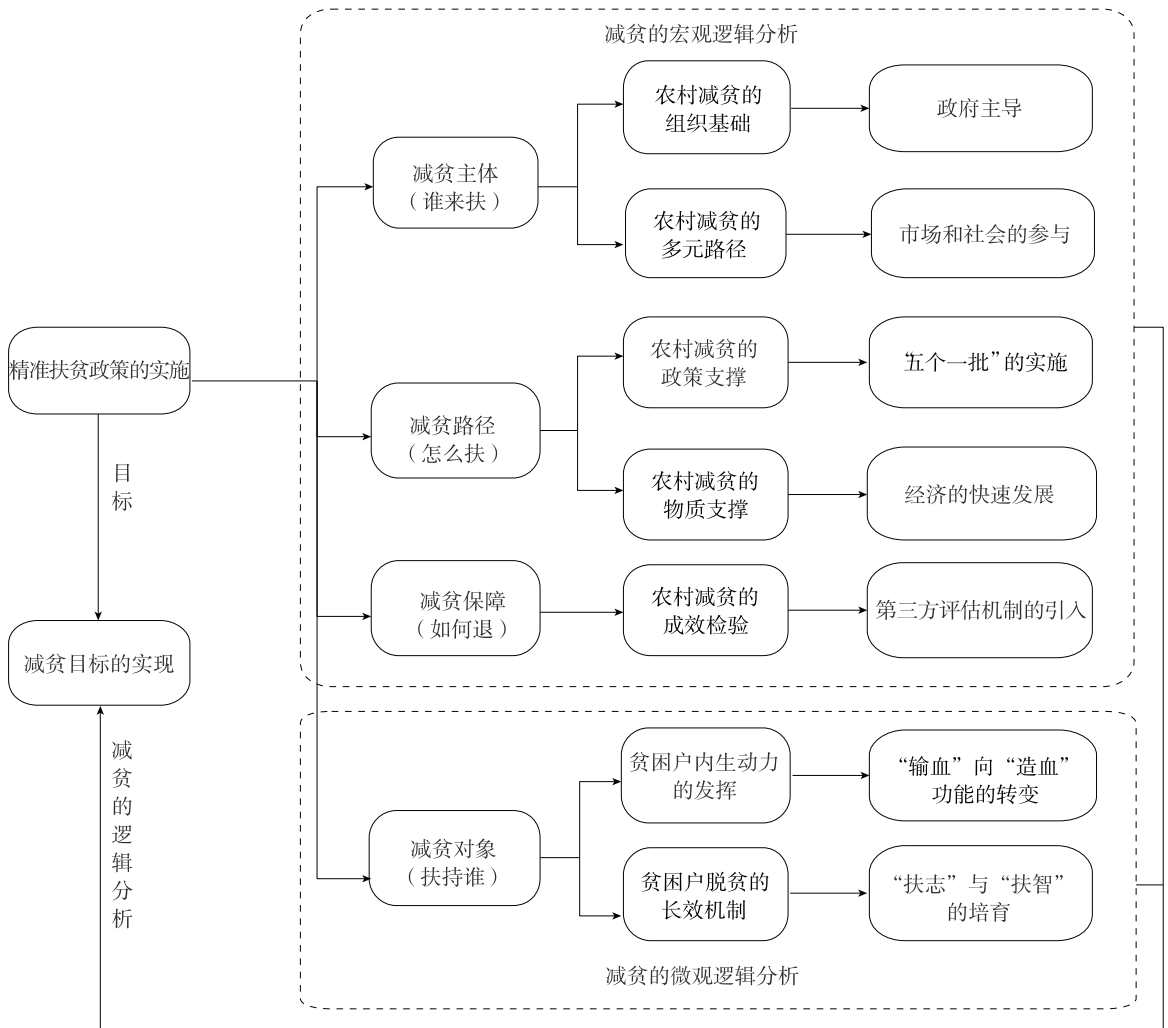


图1 精准扶贫以来农村减贫的逻辑框架

3.2 农村减贫的宏观逻辑分析

从宏观层面来看，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协同与分工提升了效率，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组织的参与以及精准扶贫各项政策的实施共同推动了农村减贫的实现。

(1) 农村减贫的组织基础：政府主导。精准扶

贫以来，各层级政府部门对任务分解，稳固推进脱贫攻坚责任落实，形成了中央统筹、省级政府负总责、市县级政府具体落实的工作机制。在具体组织实施中，中央有关部门发出专门文件，派出专门人员下沉到贫困村和党组织涣散的村担任第一书记。2018年，全国共派出乡镇扶贫干部197.4万人，保

证了有贫困人口的非贫困村基本有镇级包村工作队；县级以上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驻村干部 90.6 万人（含第一书记 20.6 万人），驻村工作队 24.2 万个，保证了全国 12.29 万个贫困村有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通过五级书记抓扶贫，中央各有关部门和省市县通力配合，建立和完善了基层治理体系，壮大了基层扶贫工作机构。驻村干部帮扶的长期化和制度化，为精准扶贫在基层的实施提供了重要的外部力量。协助两委班子确定扶持对象，参与精准管理，将帮扶主体、计划、措施等内容录入扶贫开发系统，解决了“谁来扶”的问题。

(2) 农村减贫的多元路径：市场与社会的参与。市场与社会组织是“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非政府组织和民营企业，体现了多维贫困对主体多元化的客观要求。精准扶贫以来，国家出台多项举措，鼓励和支持市场和社会组织参与农村减贫：2013 年以来，中央出台多项措施，引导和鼓励个人、企业、社会组织等机构参与到扶贫开发中，建立了多元主体参与的扶贫帮扶机制，有效推动了农村减贫。一是组织动员，让各类社会机构意识到参与扶贫开发的积极意义，促使减贫路径的多元化，缓解多维贫困问题。二是税收优惠，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制定多项措施，对企业发生的目标贫困地区的扶贫捐赠支出给予税收优惠，提高企业参与减贫的积极性。三是路径创新，如中国扶贫基金会推动实施的“顶梁柱健康扶贫公益保险项目”。该项目将健康扶贫与公益保险相结合，为现行标准下 18~60 周岁的建档立卡户提供专属扶贫公益保险，探索解决农户家庭主要劳动力的医疗保障方式，解决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

(3) 农村减贫的政策支撑：“五个一批”的实施。政策是减贫的必要条件，适当、合理、全面的减贫政策能有效推动贫困人口脱贫、贫困县摘帽。“五个一批”从发展生产、易地搬迁、生态补偿、发展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助力农村减贫^[16]。从发展生产来看，通过产业扶持政策，引导涉农相关产业发展，通过发展光伏、食用菌、水果、养殖等特色产业带动贫困户就业增收。扶贫开发政策在短期能够显著提高被扶持农民的收入水平，但扶贫开发政策在长期存在政策陷阱，十年后的政策增收效应会

逐渐减弱^[17]，大规模的扶贫开发如“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在短期内显著提高了农民收入，但是长期的效果并不显著^[18]。为避免或减弱扶贫政策陷阱，实现脱贫人口的长期稳定增收，达到“即脱贫、又致富”，离不开产业发展与脱贫人口稳定就业。从易地搬迁来看，通过将自然条件差、地质灾害频发、公共基础设施薄弱地区的贫困人口搬迁安置到自然条件好的地区，从而改善其生产生活条件。2016—2019 年，中央财政累计安排专项扶贫资金 3 843.8 亿元，年均增长 28.6%，全国已完成约 870 万贫困人口的搬迁建设任务，已有 604 万贫困人口搬迁入住^①，解决了“一方水土不能养一方人”的生存性制约。从生态补偿来看，精准扶贫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通过实施贫困人口与生态补偿对象、扶贫区域与生态补偿区域、产业发展与生态补偿措施、贫困程度与生态补偿标准、扶贫政策与生态补偿需求等方面的有机结合^[13]，建立生态补偿资金，有效带动贫困人口脱贫及贫困区域经济发展。从发展教育来看，国务院多部门印发教育扶贫相关文件，推进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等阶段教育扶贫工作，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加大财政投入力度，重点向贫困地区倾斜。5 年来，中央财政对地方教育转移支付由 2 000 多亿元增加至 3 000 多亿元。全面改善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办学条件，2014—2018 年，中央财政共安排补助资金 1 699 亿元，带动地方投入 3 700 多亿元，新建、改扩建校舍 2.2 亿 m²，采购价值 996 亿元设施设备。从社会保障来看，通过科学制定低保标准、推动实现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与扶贫开发政策有效衔接，将符合条件的重度残疾人、重病患者纳入低保，充分发挥兜底保障的作用；保障深度贫困地区特困人员基本生活、加强深度贫困地区供养服务设施建设，落实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政策；加大临时救助政策落实、明确帮扶对象、明确审批程序、拓宽救助方式，发挥临时救助的作用。

(4) 农村减贫的物质支撑：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农村减贫提供了物质支撑。一方面，经济增长具有溢出效应，促进了贫困人口收入

① 数据来源：http://www.cpad.gov.cn/art/2019/12/12/art_2202_108324.html。

的增加。从统计数据来看,2012—2018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年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速达到7.13%,同期发达经济体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为1.93%,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为4.76%^①。高速的经济增长加快了城镇化进程,客观上带动了就业,增加了有劳动能力贫困人口的收入。脱贫攻坚以来,全国累计帮助1111万农村贫困劳动力实现就业^②,贫困人口增收明显。另一方面,财政在农村减贫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19]。随着经济发展,国家能够有效增加财政供给,增加对贫困地区的财政支持。2013—2019年,中央累计专项扶贫资金支出约5131.75亿元,年均增长21.54%。其中2016—2019年,中央累计安排专项扶贫资金3843.8亿元,连续4年每年净增200亿元,年均增长28.6%。中央财政专项扶贫支出的增加,有效促进了贫困人口的减少。

(5) 农村减贫的成效检验:第三方评估机制的引入。为客观有效评价农村减贫成果,创新脱贫攻坚考核机制,2016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专门文件,引入精准扶贫第三方评估。该文件明确提出由科研机构或社会组织对地方政府扶贫开发成效进行评估。地方政府作为扶贫开发政策的具体执行者,由于缺少专门的监督部门,扶贫开发信息存在部分失真^[20];各地扶贫机构水平存在差异,工作中出现一些偏差和失误;对扶贫开发中的关键典型和不足总结不到位,不利于形成带动和警示作用。第三方评估机构的客观性、独立性、公正性解决了政府在扶贫成效评价中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问题^[21],保障了脱贫成效质量,为决策者提供了可靠依据;通过设置科学的指标体系,对贫困人口识别的精准性、帮扶主体的责任落实、帮扶资金的效率性、扶贫效果等内容进行评估,弥补了政府单一主体扶贫结构的不足,形成了纠偏机制;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树立了在产业扶贫、金融扶贫、生态扶贫、易地搬迁等领域的正面案例,发挥了示范作用;找出了负面典型,曝光了扶贫领域的违法违规行,起到了警示作用。

3.3 农村减贫的微观逻辑分析

针对贫困人口识别问题,中国从2013年开始,在收入的基础上综合考虑住房、医疗、教育等多方面情况,将未达到标准的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中,

依据致贫原因开展有针对性的帮扶,并对贫困人口实施动态调整,解决了“扶持谁”的问题。从微观层面来看,减贫的微观主体是贫困户,核心在于其主体行为的改变。只有贫困户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改变原有观念,积极提升自身能力,变“输血”为“造血”,“有志气”“有智力”,才能从根本上消除贫困。

(1) 贫困户的内生动力:“输血”向“造血”功能的转变。贫困户内生动力的发挥是减贫的关键因素。“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长期以来,贫困户缺少改变现状的动力,部分存在“等、靠、要”思想,过于依赖外力帮扶,内生动力发展不足;扶贫干部的帮扶方式与减贫需求错位,多年来形成的“发钱发物”方式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贫困户“索取”心态,造成扶贫扶于表面。精准扶贫以来,相关部门出台多项措施,培育有劳动能力贫困人群的“造血”功能。从产业方面来看,精准扶贫重视贫困人口产业参与度。国家出台专门政策促进特色产业发展、支持贫困地区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完善利益联结机制等,在带动贫困户增收的同时,提高了贫困户参与产业的意识,以产业发展“撬动”贫困户“造血”意识。从就业方面来看,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多部委出台专门措施,分类施策。一是拓宽就近就业渠道,推广支持扶贫车间、社区工厂、微工厂等,让贫困户在家门口就业;二是组织劳务输出,确定就业扶贫基地,公布适合贫困劳动力的岗位信息,组织贫困户外出务工。通过内外联合就业拓宽贫困户“造血”渠道。从职业教育方面来看,以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子女为对象,实施免费职业技能培训和“两后生”就读技工学校计划,确保贫困人口子女在培训过程中学得一技之长,以职业教育培育贫困户“造血”功能。精准扶贫之所以取得如此之大的减贫成效,贫困户“造血”意识的提升、“造血”渠道的拓宽、“造血”功能的培育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2) 贫困户脱贫的长效机制:“扶志”与“扶

^① 中国、发达经济体、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平均增长率根据2012—2018年各自经济增长率加权平均算得,数据来源于wind数据库。

^② 数据来源: http://www.mohrss.gov.cn/SYrlzyshshbz/rdzt/zyjntxsd/zyjntxsd_xdzn/201910/t20191021_337289.html。

智”的培育。贫困人口“有志气”“有智力”是中国减贫的重要举措。通过加强贫困户人力资本培育，“扶志”与“扶智”相结合，改变贫困户被动贫困现状，从根本上消除贫困。脱贫攻坚以来，脱贫意愿低、脱贫能力差是面临的实际困难。贫困人口脱贫意愿低，长期处于被动，福利依赖严重，缺少主动脱贫的“志气”；贫困人口受教育程度不高，自我发展能力不足，缺少脱贫致富的“智力”。在扶贫扶志方面，2018年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多部门制定《关于开展扶贫扶志行动的意见》，探索多种方式，激发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一是帮扶方式的改进。减少过去简单发钱发物的做法，通过设定公益岗、小型公益事业扶贫等措施，帮助贫困群众树立“劳动光荣”的理念，发挥贫困群众的主体作用。二是重视教育引导。通过乡村学校、农民夜校、讲习所等，帮助贫困群众树立脱贫信心，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主观能动性^[22]。三是移风易俗的推进。发挥基层党组织的作用，通过指定村规民约、扶贫理事会、红白理事会等作用，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改变贫困群众落实生活习惯、转变思维方式，实现反精神贫困与反物质贫困的统一。在扶贫扶智方面，以贫困户为中心，充分发挥教育扶贫的作用，从教育扶贫制度体系、重大工程项目、学生资助体系、政策倾斜、外部扶贫力量等措施入手，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实施健康扶贫，改善贫困人口营养和健康状况，提升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本。

4 2020年后农村减贫的路径分析

2020年是脱贫攻坚决胜之年，中国将实现现行标准下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坚实的基础。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和经济社会矛盾，如何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防止返贫，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笔者认为应在立足当前精准扶贫成果的基础上，提前规划减贫路径。为巩固提升现有减贫成果，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防贫机制，推进长期可持续减贫，本文从统筹减贫主体、调整减贫路径、保障持续投入、重视相对贫困4个方面提出2020年后农村减贫路径。

4.1 统筹减贫主体，巩固脱贫成果

多元化的减贫主体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建立了牢固的组织保障。政府主导、市场和社会参与的“三

位一体”减贫主体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不仅发挥了制度优势，也动员了全社会参与。脱贫攻坚任务完成后，现有减贫主体将会发生变动，如“驻村工作队”撤出贫困村，若没有完善的制度化措施，很难实现扶贫政策的持续性^[23]。这就需要统筹现有减贫主体，发挥各个主体优势。一是要实施制度化建设。建立减贫的长效机制，改变原有行政手段下的集中动员式扶贫，加快制度化减贫进程。二是要改善单纯以政府为主导的减贫模式，增强市场和社会参与减贫力度，强化高收入群体的社会捐赠，缩小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之间的差距。三是要依靠贫困户巩固脱贫成果。充分发挥贫困户内生动力和市场作用，通过市场引导使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参与产业，实现稳定就业，改善原有单纯以财政转移支付为主的财政投入方式，避免贫困户享受的权利和履行的义务不对等；通过致富带头人、龙头企业，发挥当地资源优势，分类引导贫困户发展适合自己的产业，巩固脱贫成果。

4.2 调整减贫路径，建立防贫机制

作为具有明显“行政主导型”特征的扶贫开发模式，精准扶贫的相关措施在解决绝对贫困问题方面成效显著，为农村减贫提供了路径支撑。2020年后的贫困人口主要是以老弱病残及妇女、儿童等社会弱势群体为主，行政主导下的发展主义减贫逻辑失效，需要重视普遍性的福利供给及社会保障制度^[24]，保持现有减贫政策的持续性和稳定性，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减贫路径，建立不同发展阶段的防贫机制，实现精准扶贫政策与2020年后减贫政策有效对接。一是实施以基本公共服务均化为目标的减贫策略，缓解“二元结构”下的城乡差异。在财政投入上提高深度贫困地区和农村地区的教育水平、医疗水平以及养老、儿童食物营养等基础性公共产品供给，防止脱贫户因病、因学等原因返贫的问题；强化不同梯度、不同类型公共服务人才建设；完善特殊人群的社会保障体系，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构建利贫性的社会保障体系，防止贫困人口返贫。二是将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有机结合起来，为乡村振兴提供新动能。乡村振兴战略可在目标设定、机制设计、政策措施方面与精准扶贫有机衔接，提高资源效率与政策效果。三是健全返贫风险防范监测预警机制。2018年农户可支配收入中，20%低收入

户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3 666 元^①，占 20% 高收入户的 10.77%，而这一比例在 2013 年为 13.50%，说明农户内部收入差异扩大。2018 年工资性收入及经营性收入占农户可支配收入的 77.7%^②，较 2013 年的 80.4% 有所下降，二者受市场风险的影响较大。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尤其是 2020 年上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应重点防范脱贫户返贫风险。通过设立重点人员台账“建立防贫保险”加大对不稳定脱贫户、边缘户的动态监测，将返贫户和新发生贫困人口纳入帮扶。

4.3 保障持续投入，提高资金效率

经济发展状况是未来制定扶贫战略的前提^[25]。脱贫攻坚结束后，资金投入应从持续性和效率性两个方面考虑。从持续性来说，持续的财政投入是保障减贫成效、增强人民获得感的基础。需要我们合理预测经济前景，制定与之相适应的扶贫政策，保障减贫成效。2019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990 865 亿元，较 2018 年增长 6.1%，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 1 万美元，经济结构和人民生活水平得到进一步优化和提升。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的收官之年，经济可能会受到非预期因素，如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政府相关部门应做好预警，严防可能的经济衰退。制定相关措施，如减少政府经费开支、增加财政赤字、完善多级财政分担机制、创新资金投入渠道等，保证财政在扶贫领域的投入。从效率性来看，现有财政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仍有一定的提升空间，扶贫资源投入和产出不成比例、供给和需求不匹配^[26]，财政扶贫资金投入与运行机制效率未达到最优状态^[27]。为避免“精英俘获”，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可从财政资金审计和项目规划入手。一是要完善财政扶贫资金绩效评价体系，重点对财政资金的实施过程进行控制与管理，发挥审计在过程控制中的作用；二是要完善县级财政扶持项目数据库，在项目实施中提质增效，避免县内扶贫项目同质化竞争，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4.4 重视相对贫困，优化减贫对象

脱贫攻坚任务的圆满完成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脱贫攻坚结束后，优化减贫对象，重视相对贫困问题应是题中之意。第一，要制定相对贫困的标准。相对贫困不是同一时间维度高收入与低收入之间对比下的贫困，而是不同时间维度下达到同

等生活状态下对应的贫困程度。科学制定相对贫困标准有助于提高贫困治理水平，改善相对贫困人口生活水平。相对贫困线的划定可从两个角度进行分析：一是收入角度，可以按照全国人均收入的特定比例或发展阶段确定不同的绝对贫困标准^[28]，或以居民收入中位数的 40% 作为贫困标准^[29]；二是多维贫困角度，可以以收入、资产、教育、健康等指标为基础，建立相对贫困测量标准。第二，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脱贫攻坚任务完成后，中国扶贫对象，即相对贫困人口会发生较大变化。常态化的减贫需要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推动减贫战略平稳过渡。同时将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纳入乡村振兴战略中，将其作为其中重要一环持续推进。第三，统筹城乡贫困治理体系，关注城市贫困人口。现阶段中国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城市贫困标准，也没有专门部门负责城市贫困人口认定、管理等工作。新的扶贫战略需要成立专门的部门统筹城乡新的贫困人口的认定、管理工作，解决现阶段城乡分割的贫困治理结构，重视城市低收入群体、进城农民工、农村贫困线边缘低收入人口可能的贫困问题，优化减贫对象。

参考文献

- [1] 覃志敏，岑家峰. 精准扶贫视域下干部驻村帮扶的减贫逻辑：以桂南 s 村的驻村帮扶实践为例 [J]. 贵州社会科学，2017 (1): 163-168.
- [2] 郑风田. 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内涵与脉络 [J]. 人民论坛，2020 (2): 12-15.
- [3] 罗丽. 基于随机森林算法的贫困精准识别模型研究 [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9 (6): 21-29.
- [4] VIJAYA R M, LAHOTI R, SWAMINATHAN H. Moving from the household to the individual: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analysis [J]. World Development, 2014, 59: 70-81.
- [5] KARLAN D, THUYSBAERT B. Targeting ultra-poor households in Honduras and Peru [J]. 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2019, 33 (1): 63-94.
- [6] 蒋永甫，莫荣妹. 干部下乡、精准扶贫与农业产业化发展：基于“第一书记产业联盟”的案例分析 [J]. 贵州社会科学，2016 (5): 162-168.

(下转第 29 页)

① 数据来源：2019 年《中国统计年鉴》。

② 数据来源：2019 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 专题综述

国际大粮商“一带一路”发展模式及其对中国的借鉴

◆ 李 宁¹ 陈会玲¹ 钟 钰²

- (1. 武汉轻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武汉 430023;
2.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 北京 100081)

摘要: 对国际大粮商“一带一路”区域的业务范围及其布局进行阐释, 归纳其发展模式和成功经验, 为中国粮食企业“一带一路”区域发展提供经验借鉴。国际大粮商在“一带一路”区域主要以“双向延伸产业链”模式、“全产业链+核心业务”模式、“粮食产业+金融业”模式和“期现一体化供应链”模式扩展国外业务, 其特点是生产环节采用生产集成及系统优化的先进理念、产业链各个环节高度协同、创新驱动、积极塑造良好公益形象。中国粮食企业“一带一路”区域发展的首要任务是在中央粮食企业和国有控股银行的合作下尽快构建跨国大粮商, 并采取逐步完善产业链结构、发挥中央粮食企业和其他粮食企业的互补优势、重视规模扩张的业务协同、加强企业跨文化管理、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等促进措施。

关键词: 国际大粮商; 发展模式; “一带一路”; 国际竞争力

DOI: 10.13856/j.cn11-1097/s.2020.08.003

自 2013 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 截至 2019 年年末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已达 150 多个, 这意味着中国对外开放新格局基本形成, 为中国粮食企业开拓国际发展空间提供了新契机。“一带一路”沿线地域辽阔, 耕地资源丰富, 具有粮食生产比较优势, 粮食产业链相关产品的潜在需求市场巨大, 在全球农业生产格局中占据重要位置^[1]。国际大粮商占领了世界粮食市场绝大部分市场份额, 在大宗商品领域占据着主导地位, 特别在“一带一路”布局甚广, 利润丰厚, 是中国粮食企业在国际市场重要的角力对象。目前, 中国粮食企业在“一带一路”区域的经营管理能力、科技创新能力、产业链各环节的协同

能力等方面尚与国际大粮商存在一定差距。在国内粮食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并构建开放新格局

收稿日期: 2020-04-10。

基金项目: 中国农业科学院协同创新项目“新时期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研究”(CAAS-XTCX2020027), 中国农业科学院科技创新工程项目(ASTIP-IAED-2020-01), 中国农业科学院科技创新工程人才专项“全球化视角下提升我国农业资源配置效率与保障粮食安全研究”(ASTIP-IAED-2018RC-01)。

作者简介: 李宁(1996—), 男, 四川泸州人,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粮食企业管理、粮食安全, E-mail: dngj1573@sina.com; 陈会玲(1974—), 女, 满族, 河南新野人, 副教授, 研究方向: 公共经济、粮食经济, E-mail: 734256034@qq.com。

通信作者: 钟钰, 男, 辽宁凌海人, 研究员, 教授,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农产品贸易、粮食安全, E-mail: zhongyu@caas.cn。

的背景下,有必要梳理国际大粮商“一带一路”区域的发展模式,为培育中国跨国大粮商提供经验借鉴。这对于积极推动粮食企业“走出去”,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粮商和粮食企业集团,统筹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保障中国粮食安全,推动中国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 文献综述

1.1 国际大粮商的模式

研究认为国际大粮商较早构建了从“田间到餐桌”的完整全产业链,即“农场—储存—运输—加工—分配—销售”,目前已非常完善^[2],而后将其经营业务延伸至金融和生物质能源等新兴领域^[3],通过合资、并购等方式使市场半径扩展到全球市场^[4-6],成为整个价值链的管理者^[7]。国际大粮商布局全球产业链的关键是寻求稀缺资源、区位优势、规模经济和扩大市场规模^[8],最终目标是规避农业产业链风险,攫取农业产业链超额利润^[9]。国际大粮商还拥有优秀的公司文化和卓越的供应链管理^[10]、丰富完备的人才储备库、高效的决策运营^[11]和风险管理制度^[12]。当前,国际大粮商的日常经营管理已与全球金融体系密不可分^[13]。

1.2 国际大粮商与国内粮企的比较

研究认为国际大粮商与国内粮企的股权结构存在较大差异,国内粮食企业股权集中,而国际四大粮商股权较分散^[14],有学者从产业链的角度对比分析中粮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粮集团)和美国艾地盟(ADM)公司,认为中粮集团应该延伸微笑曲线的两端,从资源导向型产业链转向以市场为导向、以技术为导向的产业链,扩大全产业链范围,拓展全球市场^[15]。在现金利息倍数和资产负债率2个影响资本利得率的关键因素上,中粮集团与ADM公司、邦吉公司无明显差异,但在经营模式上差异显著,且效率较低^[16]。此外,与ABCD(美国艾地盟、美国邦吉、美国嘉吉、法国路易达孚在业内简称ABCD)国际四大粮商相比,中国粮食企业供应链管理有待加强,供应链整合程度尚需提高^[17]。

1.3 国际大粮商对全球农业的影响

国际大粮商市场势力日益强大^[18],影响发展中

国家农业产业安全^[19]和粮食价格波动程度^[20],甚至影响粮食生产和供给,以及粮食政策的制定和实施^[21]。这种影响具有两重性^[22-23],但弊大于利^[24]。以四大粮商为例,一方面,国际大粮商通过种植合同和垂直一体化等方式加强影响力,使农民逐步失去对农业生产的控制,沦为农业劳工^[25],同时,通过自身优势和发展侧重点的差异化,形成某种事实上的合作,共同主宰国际粮食市场^[26];另一方面,美国政府与美国跨国粮商将粮食战略品的属性上升为粮食霸权的属性,垄断世界粮食交易,较多国家被迫丧失粮食主权^[27]。当前,国际大粮商不断渗透到中国粮食生产市场和粮油加工领域,对中国粮食安全造成严重影响^[28-29]。

1.4 国际大粮商在中国的发展

跨国农业垄断公司主要通过资本渗透、技术渗透和服务渗透等多种手段渗入中国农业产业链^[30],掌控大豆产业是跨国粮商布局中国的第一步,此后通过对粮食收购、加工等环节的运作力图控制中国粮食流通市场和粮食定价权,进而获取整条粮食产业链的利益^[31-33]。国际大粮商利用资金和研发优势加速进入中国种业、农资等重点领域,采用组织机构扩张方式实施技术转移内部化^[34],在研发和育种领域加深农户对高投入、高产出方式的依赖性^[35]。

综上,国内学者对国际大粮商方面的文献研究颇为丰富,但体现新时代发展趋势,针对“一带一路”区域发展的研究相对缺乏,尤其是针对国际大粮商“一带一路”发展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弱,本文旨在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

2 国际大粮商“一带一路”区域发展状况

2.1 国际大粮商“一带一路”区域的业务范围

2.1.1 ADM公司“一带一路”区域的业务分布

ADM(Archer Daniels Midland)公司“一带一路”区域的业务主要为农业服务、油籽加工、玉米和小麦加工、营养品业务4大板块,还涉及期货和保险等金融服务。农业服务主要包括油籽、谷物类获取及分销、储存、清洁、运输、贸易、农业饲料产品进出口及分销。ADM在“一带一路”国家各板块业务分布见表1。公司2018财年农业服务、油籽加工、玉米和小麦加工及营养品业务营业收入

占比分别为 38.95%、38.59%、15.98% 和 5.89%，其他业务占比 0.59%，农业服务和油籽加工业务收入合计占比达到 70% 以上，为该公司的核心业务。

表 1 ADM 公司“一带一路”沿线业务布局及相应区域

业务	所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农业服务	捷克、埃及、波兰、俄罗斯、菲律宾、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泰国、乌克兰、新加坡、匈牙利、以色列、印度、印度尼西亚、越南、中国
油籽加工	捷克、埃及、波兰、俄罗斯、罗马尼亚、泰国、乌克兰、新加坡、匈牙利、印度、越南、中国
玉米和小麦加工	保加利亚、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埃及、俄罗斯、菲律宾、罗马尼亚、泰国、土耳其、乌克兰、新加坡、匈牙利、以色列、越南、中国
营养品业务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俄罗斯、新加坡、印度、越南、中国

资料来源：ADM 公司官网资料 (<https://www.adm.com>) 和 ADM 公司 2018 年年报。

2.1.2 路易达孚“一带一路”区域业务分布

路易达孚公司 (Louis Dreyfus Company, 简称 LDC) 是一家涉及全产业链的综合性多元化食品及营养公司。LDC 在“一带一路”区域的核心业务是农产品贸易，具体主要包括谷物、油籽、果汁、货运服务、金融服务 5 大价值链和咖啡、棉花、大米和糖 4 大商品业务。LDC 在“一带一路”区域的业务板块分布见表 2。2018 财年 LDC 的价值链和商品业务营业收入占比分别为 70%、30%，经营利润占比分别为 62% 和 38%。

表 2 LDC “一带一路”沿线业务布局及相应区域

业务	所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谷物	巴基斯坦、俄罗斯、乌克兰、新加坡、印度、印度尼西亚、越南、中国
油籽	乌克兰、新加坡、印度、印度尼西亚、越南、中国、柬埔寨
大米	中国、巴基斯坦、新加坡、越南
咖啡	中国、新加坡、印度、印度尼西亚、越南
果汁	中国、波兰、新加坡

(续)

业务	所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货运服务	中国、保加利亚、新加坡、乌克兰、印度尼西亚
棉花	中国、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新加坡、印度
糖	中国、印度尼西亚、新加坡、俄罗斯、马来西亚、乌克兰、印度
金融服务	新加坡

资料来源：LDC 公司官网资料 (<https://www ldc.com>) 和 LDC 2018 年年报。

2.1.3 嘉吉公司“一带一路”区域业务分布

嘉吉 (Cargill) 公司在“一带一路”区域的业务主要为农业服务、动物营养与蛋白质、食品配料及应用、工业及金融服务 4 大板块，其中，动物营养和农业服务为其核心业务。嘉吉公司各业务板块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区域布局见表 3。

表 3 嘉吉公司“一带一路”沿线业务布局及相应区域

业务	所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农业服务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埃及、巴基斯坦、保加利亚、波兰、俄罗斯、菲律宾、罗马尼亚、马来西亚、泰国、乌克兰、新加坡、匈牙利、印度、印度尼西亚、越南、中国
动物营养与蛋白质	埃及、巴基斯坦、波兰、俄罗斯、菲律宾、罗马尼亚、马来西亚、泰国、土耳其、乌克兰、新加坡、匈牙利、印度、印度尼西亚、越南、中国
食品配料及应用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波兰、俄罗斯、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土耳其、新加坡、匈牙利、印度、印度尼西亚、越南、中国
工业及金融服务	巴基斯坦、保加利亚、波兰、菲律宾、马来西亚、土耳其、乌克兰、新加坡、印度、印度尼西亚、越南、中国

资料来源：嘉吉公司官方网站资料 (<https://www.cargill.com/home>) 和嘉吉公司 2018 年年报。

2.1.4 邦吉公司在“一带一路”区域的业务及分布

邦吉 (Bunge Limited) 公司为全球领先的农业综合企业和食品公司，公司在“一带一路”区域的主要业务包括农业综合服务、食品和配料、糖和生物物质能源、肥料 4 大板块，2018 财年其营业收入

占比依次为 39%、39%、16%、6%。其中, 农业综合服务及食品和配料为其核心业务, 2018 年其核心业务销售额占总销售额的 70.41%。邦吉公司的油籽加工能力在南美洲、北美洲、欧洲和亚太地区分别占 33%、27%、26% 和 14%^①, 其食品和配料业务主要分布于美国、巴西和墨西哥, 糖和生物质能源业务主要在巴西, 肥料业务分布于阿根廷、乌拉圭和巴拉圭, 港口设施主要设在阿根廷和巴西。

2.2 四大粮商在“一带一路”区域布局的阐释

2.2.1 “一带一路”区域投资潜力巨大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较多为发展中国家, 农产品种类丰富, 农业产能提升潜力大^[36], 市场需求广阔。主要农产品包括谷物、蔬菜、禽畜、水果、糖、油料作物、动植物油等, 农业增加值居世界前列, 大部分农业用地面积占国土面积比重较高^[37], 总耕地资源丰富, 但人均不足, 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加剧了耕地不足状况的恶化, 潜在市场需求巨大, 其中非洲对大米的需求约占全球需求的 1/3, 且多数国家处于干旱半干旱地区, 农业灌溉效率低下^[38]。“一带一路”区域丰富的耕地、廉价的劳动力和旺盛的粮食需求成为国际大粮商粮食产业投资的理想资源属地和广阔的市场基地。

2.2.2 “一带一路”区域具有粮食贸易比较优势

“一带一路”沿线是全球粮食产销量较高的地区之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 中国、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国、泰国和越南为稻谷主产国; “一带一路”区域分布着世界 5 大玉米主产国, 分别为中国、俄罗斯、乌克兰、孟加拉国、波兰。小麦是“一带一路”区域中播种面积最大的粮食品种^[39], 产地主要集中在欧洲和亚洲地区, 如中国、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伊朗、土耳其、俄罗斯和乌克兰。2018 年食用植物油产量全球前 10 位中, “一带一路”区域占 5 位, 分别为印度尼西亚、中国、马来西亚、乌克兰和俄罗斯。“一带一路”沿线有世界 3 大稻米消费国, 分别为中国、印度尼西亚和泰国。“一带一路”区域聚集着诸多粮食贸易大国, 农产品进出口市场活跃。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豆进口国, 中国、尼日利亚、伊朗、沙特阿拉伯是世界主要稻谷进口国, 韩国、埃及、伊朗、阿尔及利亚、马来西亚等国玉米进口占比较大, 中国、巴基

斯坦、沙特阿拉伯、葡萄牙、土耳其是主要的油菜籽进口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贸易优势显著。泰国和巴基斯坦是世界两大稻米出口国, 乌克兰为世界主要的玉米出口国, 俄罗斯、乌克兰等是小麦的新兴出口国, 乌拉圭和乌克兰是主要的大豆出口国, 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是主要的油菜籽出口国。“一带一路”区域的粮食贸易比较优势成为国际大粮商竞相布局的关键, 例如, LDC 是南非白玉米出口市场龙头企业、乌克兰 3 大谷物和油籽出口商、中国大豆油与植物油主要供应商, 也是中东、非洲和亚洲最大小麦和玉米进口商, 以及俄罗斯的主要粮食出口商, 年贸易额在 150 万~300 万 t。

2.2.3 “一带一路”区域能实现国际大粮商的战略布局

“一带一路”区域广阔, 蕴含丰富的地理资源和经济资源, 具有实现布局优化的战略空间。例如, 新加坡以及中国北京、上海、香港等地适合总部驻扎, 常规资源密集、成本较低的地区适合设立加工基地, 实现各区域优质资源的最佳配置。新加坡是 ADM 控股的益海嘉里集团总部、嘉吉亚洲总部, 世界许多著名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均选择落户新加坡, 这得益于其优越的地理资源禀赋。新加坡是世界海上十字路口, 依托其丰富的人力资源、强大的科研能力、咽喉要道马六甲海峡和优质公共服务, 成为亚洲仅次于中国香港自由贸易港。

3 国际大粮商在“一带一路”区域的发展模式

3.1 “双向延伸产业链”模式

“双向延伸产业链”指国际大粮商前向并购粮食收储企业等前置生产环节, 后向并购粮食贸易企业等后置销售环节, 将产业链上下游业务整合在一起的组织架构(图 1)。“双向延伸产业链”本质上是纵向一体化, 意味着商品在企业内部流通, 不在公开市场销售, 以此实现内部化经营成本, 最小化价格发现空间, 提高产业链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国际大粮商通过纵向一体化扩大经营规模, 提高行业壁垒, 强化公司市场势力, 增强生产和销售方面的渗

① 邦吉公司 2018 财年年度财务报告。

透力。例如，邦吉公司在产业链上游以南美为中心开展化肥业务，生产各种肥料产品，并与农民或农场签订合同，提供种子、化肥、技术支持、融资服务等，让农民以收获的农作物归还贷款。这种“农资+农场”的方式不仅控制了农产品原料成本，而

且使企业内部各业务单元间产生协同效应。同时，在产业链终端积极构建物流网络、运营港口，降低公司交易成本，产品以低成本方式销往各个地区，增加垄断利润并保障供应，最终达到全产业链利润最大化运营目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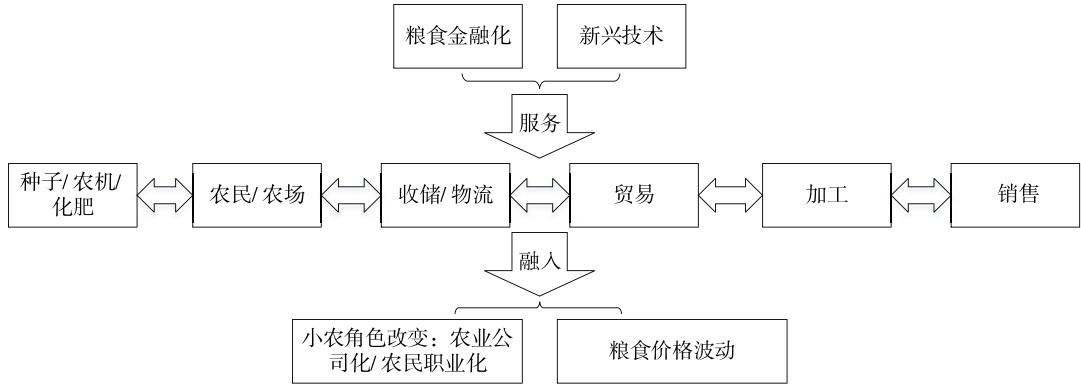


图1 四大粮商产业链布局

3.2 “全产业链+核心业务”模式

在“全产业链+核心业务”模式中，“核心业务”指农产品加工业务，“全产业链”指包括收储、物流、贸易、销售各环节从“农田到餐桌”的闭环链。如图2所示，以ADM公司为例，其核心业务是农业服务和油籽加工，在加工环节建立核心能力，形成强大的农产品加工能力，在初加工环节实现规模化运营，降低运营成本，在深加工环节注重研发，抢占价值链高地，其收储、物流、贸易和销售环相扣，支撑加工业务，形成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实现对整条产业链的控制，并降低经营风险。再加上其完善的覆盖全球的农产品物流网络，使得该公司的产品和服务能够深入到世界主要农产品市场，实现利润最大化。邦吉公司的核心业务是农业服务，整合粮油产业链，经营粮食和油料的加工、贸易和零售等业务。LDC公司的核心业务是农业服务，包括谷物、油籽、果汁等农产品贸易、货运服务和全球风险管理。在“全产业链+核心业务”模式下，国际大粮商既具备控制整个产业链的能力，又在某一细分领域增强了核心竞争力，提高了企业抗风险能力，各业务部门间能够较好发挥协同效应，降低运营成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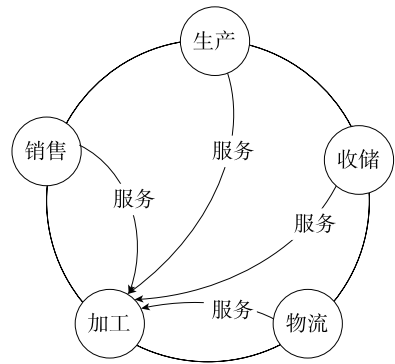


图2 ADM公司“全产业链+核心业务”模式

3.3 “粮食产业+金融业”模式

“粮食产业+金融业”模式是在国际大粮商经过多年发展，转型为资本密集型企业后，根据发展需求，将粮食产业经营业务与金融资本业务紧密结合的产物。国际大粮商的发展离不开雄厚的资本，企业扩张、套保避险对资金保障程度要求较高，须建立并依赖各类金融机构，以谋求利润最大化。如今，国际大粮商均设有金融子公司，利用其雄厚的资本和强大的金融团队为公司业务的发展提供金融领域的服务，满足企业发展的资本运营需求，充当公司的资本后盾，降低公司经营管理风险，如图3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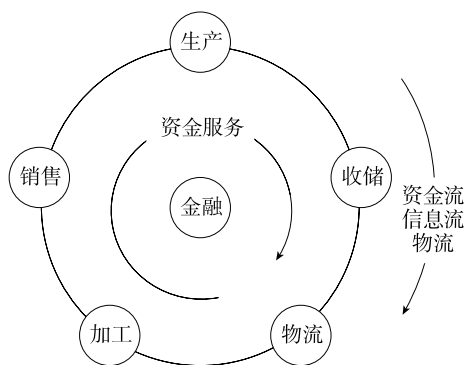


图3 “粮食产业+金融业”模式

例如，ADM公司旗下有4家金融企业，业务含房产交易、涉农运作、投资咨询业务、期货交易和结算服务、风险管理和产品设计服务等。邦吉公司在农产品贸易中也涉及结构融资业务、金融风险管理服务，还从事外汇和其他金融工具的交易。在巴西，邦吉公司为农民提供融资服务并获取巨额利息收入，2018年在巴西的农民信贷业务利息收入高达3 000万美元。

3.4 “期现一体化供应链”模式

“期现一体化供应链”模式是指，一方面，国际大粮商通过收购、兼并、重组等方式实现纵向一体化，掌握着供给端农产品基本生产情况和市场需求等信息，在获取供给和需求信息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并通过掌握基本农产品供给，提高对整个产业链的控制，取得现货市场定价权；另一方面，利用金融市场进行杠杆融资、风险管理、套期保值等方式以规避价格风险，或者通过对比分析所掌握的现货端和期货端数据，充分发掘市场盈利机会，深度参与农业衍生品市场，利用金融市场控制现货市场，如图4所示。国际大粮商不满足于纯粹经营粮食现货市场的低利润率，利用粮食期货市场规避价格风险，实施双向操作，使其在国际市场粮食价格上涨或下跌时均能获利^[40]。另外，农产品期货市场具有农产品价格发现功能，对现货市场的农产品价格具有一定影响，为降低现货市场价格波动风险并攫取金融投机利润，融合期现市场，实现供应链“期现一体化”成为必然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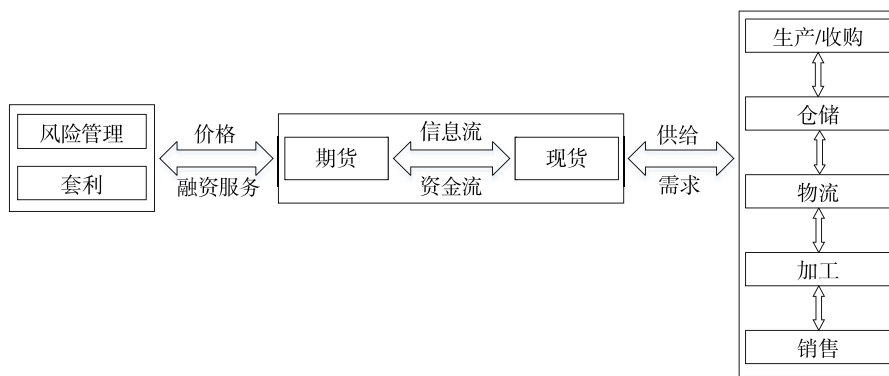


图4 “期现一体化供应链”模式

4 国际大粮商在“一带一路”区域发展的主要经验

4.1 生产集成及系统优化的先进理念

生产集成系统有助于提高生产系统的敏捷性，适应新竞争环境下满足顾客全方位需求的根本要求^[41]。例如，LDC以客户为中心，将谷物平台、油籽平台、果汁平台、货运平台、全球市场平台集成并优化。LDC的系统集成优化对于创造价值至关重要：①通过SHE (safety, health or the environment) 管理确保安全和可持续的运营。②通过质量、产量和过程监控

确保可靠的交付。③通过优化运营和资本支出来支持财务业绩。④通过标准化最佳程序和利用新技术提高效率。⑤通过优化资产基础管理来创造更多价值，全球维护能力中心还设定了整体设备效率。油籽平台能力中心为每种油籽资产的每个加工活动（破碎、精炼、生物柴油生产）建立工作档案，为每个工厂的每个流程提供详细数据分析。

4.2 产业链各环节高度协同

协同效应的实质是通过业务活动、经济资源和信息的关联共享，实现规模经济效益和范围经济效益^[42]。主要协同方式有：①国际大粮商通过垂直整

合和横向扩张,将业务涵盖整条粮食产业链,同时注重产业链之间的高度协同,实现最佳运行效率和整体收益。②通过在核心业务建立核心竞争优势,实现规模化运营,该模式随着产品线的扩展,灵活运用到其他业务,快速获得市场优势,同时巩固原有业务的发展,实现横向协同。③通过在产业链各环节建立核心能力,与上下业务单元协同,降低企业单一环节的运营风险,降低运营成本,获得粮食产业成长的整体红利。此外,位于全球各地的产业链上下游业务所需的原材料、库存可以共享资源,最大化资源利用率。例如,邦吉把自己的业务分为内在联系密切的农业综合服务、食品和配料、糖和生物质能源、肥料业务4大部门,各业务之间相辅相成,通过成本内部化获得成本优势。在巴西,邦吉与粮食生产主体之间形成的生产资料与粮食间的错期实物交易或粮食实物偿还贷款等借贷模式比较成熟,农业综合服务和肥料业务还在仓储、运输环节获得了规模效应和协同效应,并以其食品和配料业务收益分散农业综合服务和化肥业务的周期性风险。

4.3 创新研发驱动,引领市场供求

研发创新是跨国企业在全竞争中获得良好业绩的主要决定因素^[43],以保持技术领先,抢占新兴热点领域的制高点,引领市场供求。主要在于:①国际大粮商始终保持研发上的巨额投入,阻止后进入者建立研发环节的后发优势。2018年ADM的研发费用(扣除政府补助金的偿还额)达到1.41亿美元,其科技创新成果有力带动了产业价值链的完善提升;LDC亦多投资于影响其价值链的尖端和颠覆性技术,包括区块链和农业技术等数字解决方案,不断促进农业产业各方面的技术变革,从输入技术到使用移动应用程序、DNA可追溯性技术、无人机和大数据的精准农业,致力于实现农业运输的标准化和数字化,不断开发增值产品扩大收入来源。②国际大粮商抢先投资转基因和生物质燃料等领先市场,为获得垄断利润研发投入。孟山都、先正达的转基因技术经验丰富,成为该领域的行业翘楚。嘉吉和邦吉竞相拓展生物质燃料市场,成为领先的生物质能源公司。

4.4 塑造公益形象,获得客户认同

国际大粮商在扩张过程中,非常注重文化软实力的培育。采取的主要手段有:①通过积极与联合

国及各地慈善机构、社区合作,组织志愿者活动,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塑造良好公益形象。②积极参与各种论坛,成为各类组织会员,举办各类奖项评比,宣传公司“优秀公民”企业形象。嘉吉在世界各地的员工和退休人员每年将超过10万小时用于志愿活动。2016财年,嘉吉在57个国家和地区的慈善捐赠达到5000万美元。ADM是200多个商业(贸易)协会和可持续发展计划的成员,与热带森林信托基金会(TFT)以及其他行业合作伙伴结成伙伴关系,支持农村社区蓬勃发展。LDC积极参与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WBCSD)的论坛,与专家学者和非政府组织等各类组织团体协商各类基本倡议,参加世界经济论坛峰会并与政府当局讨论。

5 促进中国跨国粮食企业“一带一路”区域发展的建议

加入WTO以来,以中粮集团、江苏丰尚集团、西安爱菊集团为代表的中国粮食企业,为增强竞争力,加紧布局全球,积极参与国际竞争,获得了较好实绩。但是,中国粮食企业在深度参与“一带一路”过程中面临诸多问题,现以中粮集团为例进行具体分析。

5.1 中国跨国粮食企业参与“一带一路”的主要做法

5.1.1 创新资本经营方式,布局全球粮食产业

中粮集团通过吸收外部投资、资产证券化等资本经营方式,完善全球产业布局。在国内,2016年与中纺集团实施战略重组,中纺集团以全资子公司身份整体并入中粮集团。重组后的中粮集团发挥其各产业环节和生产要素的协同效应,提升其粮油领域的综合加工能力、市场覆盖能力以及物流保障能力,中粮集团的全球布局进一步得到完善。在国际上,2011年并购澳大利亚Tully糖业,其后实现完全控股;2014年联合厚朴基金、淡马锡等财务投资人全资收购新加坡来宝农业和荷兰尼德拉公司。通过并购,中粮集团以最小的投入,迅速布局大洋洲、南美、黑海及亚太等世界粮食核心区,有效提升了国际粮油市场上的话语权。

5.1.2 打造专业化平台,完善全球业务架构

中粮集团在全球已形成4大类18个专业化平台,打通种植、采购、仓储、加工、物流和港口相关产业链,实施跨品类、跨领域经营,业务遍

及 140 多个国家和地区, 拥有全球性的生产采购平台和贸易网络。在南美洲、黑海等粮食主产区和亚洲新兴市场间建立起稳定的粮食走廊, 围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推进重点项目, 在南美洲、北美洲、澳大利亚、黑海、中东、远东等世界粮食核心产区建设仓储、码头和物流设施等战略资源, 在东南亚地区建立农粮加工设施等, 已经形成覆盖全球的业务架构, 形成连接 6 大洲的贸易通道, 有效地推动了“一带一路”农粮经贸交流和业务协同发展。

5.1.3 发挥比较优势, 打造全球全产业链

中粮集团率先提出并实施全产业链模式, 以坚守主业的逻辑向上下游扩张, 向上进入粮食供应和生产领域, 向下延伸至销售服务环节。在上游, 以改革创新方式提供订单农业、粮食银行、农资服务、农机服务和农业金融等农业综合服务; 在中游, 发挥产业集聚, 发展粮油精深加工, 延伸产业链, 提升价值链; 在下游, 通过打造蒙牛、中粮、福临门等核心品牌, 发挥“品牌引领”效果, 促进全产业链升级。

5.1.4 注重科技研发和信息技术, 奠定全球化基础

中粮集团科技创新取得显著发展, 粮食储藏应用技术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粮油加工工艺、饲料加工装备已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其广泛采用智能化、信息化手段建设具有高效快速采集信息、传输数据、高速计算和智能处理能力的智慧园区, 可针对不同业务需求, 采取智能工厂方案, 建成面向各层次需求和业务发展的网络基础平台。其中的“中粮智慧农场”是中国首个世界级农业综合体, 以自动化、工厂化和智能化为特征, 实现低消耗、高产出、立体化和节约化等目标。

5.2 中国跨国粮食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存在的主要问题

5.2.1 全球化资本经营能力不强

跨国粮食企业的国际化经营需要将固有的企业经营管理模式与国际化管理模式有效融合, 这是中国跨国粮食企业面对的最大难题。其中, 关键是缺乏国际化经营管理人才, 特别是既精通业务、熟悉国外政策法规和文化传统, 又具有资本运作经验的高端复合型人才明显不足, 不利于国际化竞争。

5.2.2 技术创新能力有待提升

在粮食产业科研投入、粮食科技人才储备、粮油机械创新方面与国际大粮商相比仍显滞后。例如,

在减少损失浪费、拓宽粮食加工转化途径、降低物流成本等方面亟须科技攻关; 在粮食质量安全检验监测网络建设及快速检测方面存在瓶颈; 在提高粮食附加值的深度加工技术、种子技术等方面成长空间很大。

5.2.3 产业链的完整性和产业环节协同性不足

由于缺乏高新技术, 高端产业链布局困难; 由于缺乏对当地文化和内部制度的了解, 低端粮食产业链布局不能得到有效拓展。虽然中粮集团资本实力雄厚, 但不可能布局所有的产业链环节, 空白区域和环节急需补位。

5.3 国际大粮商对中国跨国粮食企业参与“一带一路”的启示

5.3.1 发挥中央粮食企业和其他粮食企业的互补优势

依照企业竞争优势, 以央企为主体带动其他粮食企业, 共同合作并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大粮商。其他粮食企业可以选择具有竞争优势的业务, 突出竞争优势, 先盯住粮食产业链的一个或几个环节, 在国际粮食产业内打响品牌, 提高竞争力和影响力。

5.3.2 健全供求双侧驱动的加工体系, 重视规模扩张的业务协同

提升中国粮食企业竞争力, 应以高附加值的加工环节为核心, 确保上游产业链的粮食种植、运输等为高附加值的加工业服务, 下游的包装、运输、销售等为消费者服务。建立可追溯供应链, 确保产品供应链透明、监督有效。另外, 中国粮食企业在进行一体化经营时, 可根据企业发展的战略目标, 通过合资、并购、联营、独资等方式向新的国家或地区拓展, 在实现规模经济和多元化发展的同时, 注重业务间的协同, 共享资源信息, 使企业扩张后的资产整合形成协同效应。

5.3.3 加强企业跨文化管理, 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对于跨国粮食企业而言, 尤其需要以文化为纽带, 建立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互利互信。加强跨国粮食企业的文化管理, 可以采取的措施有: 从国家层面, 组织各类民间和官方的交流活动, 增进文化沟通和文化认同。在企业层面, 一是尊重各地区的文化, 正视文化差异, 增强文化交流, 避免跨文化冲突; 二是内化企业文化机制, 进行跨文化管理和文化差异整合; 三是构建共同的组织远景, 加强员

工培训,提高彼此文化的认同和接受程度。

参考文献

- [1] 刘乃郗,韩一军.“一带一路”农业合作发展的意义与前景[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7(24):82-85.
- [2] 王玲,马金杰,张拓尊,等.“四大粮商”对北大荒集团打造世界粮商的启示[J].农场经济管理,2014(12):9-13.
- [3] 吕向东,张晓颖,徐锐钊,等.跨国粮商发展战略对中国农业“走出去”的启示[J].世界农业,2014(11):15-17.
- [4] AMANOR K S. Global value chains and agribusiness in Africa: upgrading or capturing smallholder production? [J]. *Agrarian Sou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19, 8 (1/2): 30-63.
- [5] 邵腾伟. 国际大粮商的成长规律及对中国农垦的启示[J].湖北社会科学,2017(5):76-84.
- [6] 孙梦瑶,祝自冬,朱增勇.跨国粮商全球投资战略[J].世界农业,2016(10):215-218.
- [7] CLAPP J. ABCD and beyond: from grain merchants to agricultural value chain managers [J]. *Canadian Food Studies*, 2015, 2 (2): 126-135.
- [8] 周伟,吴先明.日本跨国粮商的发展战略及驱动因素研究:基于丸红的案例研究[J].亚太经济,2015(5):78-83.
- [9] 林文维,谭砚文.农业跨国公司产业链布局的现状与成因分析[J].世界农业,2011(11):15-18.
- [10] 王英姿,黎霆.国际粮商的农业供应链管理及其对我国的启示:以美国嘉吉公司为例[J].中国发展观察,2013(2):60-62.
- [11] 刘超,张靓.借鉴国外成功经验打造中国跨国粮商[J].世界农业,2015(6):25-27.
- [12] 吕东辉,杨印生.跨国粮商套期保值行为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13,34(12):77-80.
- [13] NITSENKO V, ZAKHARCHENKO O. Operation of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mnc) in the global agricultural market [EB/OL]. (2014-12-16) [2020-02-17].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29699596>.
- [14] 蒋丽云.国内外四大粮商治理结构有效性的比较研究[J].科技创业月刊,2015,28(21):43-44.
- [15] LI N, ZHU L, ZHU P.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OFCO and ADM based on the whole industry chain strategy [C]. Shenzhen: IEEE, 2011.
- [16] 吕东辉,许頔,于延良,等.跨国粮食企业培育:中粮与ADM、邦吉经营模式的比较研究[J].农业技术经济,2015(4):12-18.
- [17] 陈倬,景琦,王锐.大型粮商主导的粮食供应链整合研究:基于SIR模型的实证分析[J].江苏农业科学,2016,44(11):555-559.
- [18] 吕东辉,翟莹,张桂颖.跨国粮商对大豆市场波动的影响研究:基于Hidden Markov模型的研究[J].价格理论与实践,2016(6):62-64.
- [19] 张宁,康伟立.跨国农业公司全球扩张对发展中国家农业产业安全的影响[J].世界农业,2013(8):114-117+176.
- [20] MURPHY S, BURCH D, CLAPP J. Cereal secrets: the world's largest grain traders and global agriculture [EB/OL]. (2012-08-03) [2020-02-17]. <https://www.oxfam.org/en/research/cereal-secrets-worlds-largest-grain-traders-and-global-agriculture>.
- [21] 王宏.跨国农业公司对粮食安全的影响:机理与政策[J].甘肃理论学刊,2013(1):118-122.
- [22] 尹成杰.农业跨国公司与农业国际化的双重影响[J].农业经济问题,2010,31(3):4-10+110.
- [23] 张莉侠,张锦华.跨国公司的扩张对中国粮食安全的影响与对策[J].农业经济,2012(10):79-81.
- [24] 曹荣湘.跨国农业食品公司对世界粮食安全的影响[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8(8):44-48.
- [25] 尹炳先,王得忠.跨国农业公司对全球农业和食品加工业的破坏性影响[J].国外理论动态,2007(8):44-47.
- [26] 朱勤,勤裴晗,高铁生.经济全球化视野下跨国粮商对我国粮食安全的影响[J].经济研究参考,2015(56):3-23+89.
- [27] 徐振伟.世界粮食危机与中国粮食安全[J].东北亚论坛,2012,21(3):28-35.
- [28] 余莹.跨国公司控制粮食产业链战略对我国的影响及对策[J].甘肃社会科学,2014(6):146-148+251.
- [29] 白梦娇,贾利军.跨国垄断下我国粮食安全的威胁与保障[J].农业经济,2017(3):120-122.
- [30] 罗浩轩.跨国农业垄断公司对中国农业产业链的多维渗透及破解思路[J].西部论坛,2020,30(1):39-49.
- [31] 吴志华,徐艳丹,胡非凡.跨国粮商冲击下的粮食流通安全问题探析[J].南京财经大学学报,2011(3):11-17.
- [32] 王帅.农业跨国公司对中国农业的投资:现状、问题与建议[J].中国流通经济,2012,26(1):58-62.
- [33] 李竣,杨旭.跨国粮商冲击下的粮食收储参与主体决策分析[J].世界农业,2015(1):24-27+47+203-204.
- [34] 任静,刘丽军,宋敏.跨国公司在我国农业领域的技术锁定策略与对策研究[J].中国软科学,2012(1):39-46.
- [35] 周伟, MATHIEU B, 吴先明.农业跨国公司垄断对我国粮食安全的影响[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6(3):84-93.

- [36] 孙致陆, 李先德.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粮食发展潜力分析 [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7 (1): 32-43+141.
- [37] 李富佳, 董锁成, 原琳娜, 等. “一带一路”农业战略格局及对策 [J].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16, 31 (6): 678-688.
- [38] 刘清杰.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资源分析 [J]. 经济研究参考, 2017 (15): 70-104.
- [39] 贾琨, 杨艳昭, 封志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粮食生产的时空格局分析 [J]. 自然资源学报, 2019, 34 (6): 1135-1145.
- [40] CLAPP J. Financialization, distance and global food politics [J].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2014, 41 (5): 797-814.
- [41] 张青山, 王静. 顾客为中心生产的集成化计划与控制方法研究 [J]. 管理工程学报, 2008 (1): 151-154.
- [42] 陈志军. 企业并购后的协同效应及其实现 [J]. 东岳论丛, 2002 (3): 42-44.
- [43] FRANKO L G. Global corporate competition: who's winning, who's losing, and the R&D factor as one reason why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89, 10 (5): 449-474.
- (责任编辑 张雪娇 卫晋津)
- (上接第 19 页)
- [7] 王晓毅. 精准扶贫与驻村帮扶 [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6 (3): 56-62.
- [8] 闫东东, 付华. 龙头企业参与产业扶贫的进化博弈分析 [J]. 农村经济, 2015 (2): 82-85.
- [9] 李军红. 基于乡村文化资源开发的产业扶贫路径探析 [J]. 东岳论丛, 2019, 40 (2): 107-114.
- [10] 庞庆明, 周方. 产业扶贫时代意义、内在矛盾及其保障体系构建 [J]. 贵州社会科学, 2019 (1): 149-153.
- [11] 朱永甜, 余劲. 陕南易地扶贫搬迁减贫效应研究: 基于分阶段的讨论 [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20, 34 (5): 64-69.
- [12] 曾小溪, 汪三贵. 打赢易地扶贫搬迁脱贫攻坚战的若干思考 [J]. 西北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9, 56 (1): 123-131.
- [13] 刘春腊, 徐美, 周克杨, 等. 精准扶贫与生态补偿的对接机制及典型途径: 基于林业的案例研究 [J]. 自然资源学报, 2019, 34 (5): 989-1002.
- [14] 付卫东, 曾新. 十八大以来我国教育扶贫实施的成效、问题及展望: 基于中西部 6 省 18 个扶贫开发重点县 (区) 的调查 [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9, 58 (5): 45-56.
- [15] 汪三贵, 曾小溪, 殷浩栋. 中国扶贫开发绩效第三方评估简论: 基于中国人民大学反贫困问题研究中心的实践 [J].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6, 17 (3): 1-5.
- [16] 章文光. “五个一批”助力脱贫攻坚 [J]. 人民论坛, 2019 (20): 62-63.
- [17] 周玉龙, 孙久文. 瞄准国贫县的扶贫开发政策成效评估: 基于 1990-2010 年县域数据的经验研究 [J]. 南开经济研究, 2019 (5): 21-40.
- [18] 王艺明, 刘志红. 大型公共支出项目的政策效果评估: 以“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为例 [J]. 财贸经济, 2016, 37 (1): 33-47.
- [19] 刘明慧, 侯雅楠. 财政精准减贫: 内在逻辑与保障架构 [J]. 财政研究, 2017 (7): 9-22.
- [20] 莫光辉, 张菁. 精准扶贫第三方评估长效机制建构策略: 2020 年后中国减贫与发展前瞻探索系列研究之一 [J]. 苏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39 (6): 113-120.
- [21] 拓兆兵. “第三方评估”提升脱贫攻坚精准度 [N]. 经济日报, 2016-12-16 (9).
- [22] 蒋永穆, 万腾, 周宇晗. 基于政府集成的中国特色减贫道路 (1978—2018): 历史进程和逻辑主线 [J]. 当代经济研究, 2018 (12): 51-58.
- [23] 李小云, 许汉泽. 2020 年后扶贫工作的若干思考 [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8 (1): 62-66.
- [24] 万兰芳, 向德平. 中国减贫的范式演变与未来走向: 从发展主义到福利治理 [J]. 河海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20 (2): 32-38.
- [25] 陈志钢, 毕洁颖, 吴国宝, 等. 中国扶贫现状与演进以及 2020 年后的扶贫愿景和战略重点 [J]. 中国农村经济, 2019 (1): 2-16.
- [26] 曾小溪, 汪三贵. 论决胜脱贫攻坚的难点和对策 [J]. 河海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21 (6): 10-17.
- [27] 刘天琦. 我国农村财政扶贫资金投入与运行机制的优化问题研究 [D]. 北京: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8.
- [28] 蔡昉. 探讨脱贫攻坚战略的“未来升级版” [N]. 经济日报, 2020-01-08 (11).
- [29] 叶兴庆, 殷浩栋. 从消除绝对贫困到缓解相对贫困: 中国减贫历程与 2020 年后的减贫战略 [J]. 改革, 2019 (12): 5-15.
- (责任编辑 卫晋津 张雪娇)